添加于2026年10月13日



Grace
Triumphant

神的恩典在菲律宾得胜

Cyril H. Brooks 自传

第八卷的姊妹篇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 主啊，求你把这座山赐给我们

Grace Triumphant（恩典得胜）

神的恩典在菲律宾得胜

自传

作者：CYRIL H. BROOKS

Copyrigh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Kansas City, Kansas。ISBN 0-937396-66-4。版权所有。

印刷版书中的经文用的是 NIV。网络版用的是 KJV，因为它属于公有领域，可以避免任何版权问题。

1985年这本书里的照片是 Ken Engle 挑选的，照片说明也是他写的。全书也可以在 plymouthbrethren.org 上阅读。

关于这个版本

Cyril H. Brooks 就是邀请 Ken Engle 来菲律宾的那位宣教士。从1951年3月一直到结婚，Ken 都住在 San Juan 的 Brooks 家里；他和 Mary Lou 终其一生都称他们为 Brooks 爸爸和 Brooks 妈妈。

1985年，Brooks 爸爸写完了这本书，讲述他自己在菲律宾六十年的经历。Ken 为书挑选了照片，写了照片说明，Mary Lou 也主动提出帮忙校对。1985年10月24日，十本书寄到了 Abilene。四个月后，Brooks 爸爸就回天家去见主了。

书中凡是出现 Engle 一家的地方，页边都标有一条红线，并附有注释，指向本系列中讲同一个故事的其他地方。Ken 在他自己那本书上做的更正，也都写在这些注释里。

Brooks 夫妇的故事、他们写给 Engle 一家的信，以及 Brooks 爸爸的文章，都收录在第八卷：Cyril 与 Anna Brooks里。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目录

引言 5
1. 一切开始的地方 6
2. 童年时光 10
3. 在加拿大的生活 20
4.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 28
5. 蒙召去禾场 37
6. 为去禾场作准备 45
7. 关于禾场的引导 54
8. 开始我们的宣教工作 62
9. 回到 Manila 74
10. 我们第一次休假 85
11. San Juan 工作的开始 95
12. 忙碌的十年 106
13. 战云密布 117
14. 日本占领时期 127
15. 拘留营里的生活 136
16. 从拘留营获释 144
17. 踏上归途！ 153
18. 终于到家 162
19. 战后的宗教和政治状况 171
20. San Juan 的重建 179
21. 教会的成长 189
22. 教会继续成长 200
23. The Bible School of the Air 213
24. 营会事工 225
25. 在福音上同心合意 233
26. 在基督里的同工 244
27. 福音的进展 258
书中出现 Engle 一家的地方 271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引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法国打了两年仗——在危险的时刻蒙了拯救。得了肺炎和胸膜炎住进医院——医生断定：“他活不过今晚！”在菲律宾多年的宣教服事，包括日本占领期间和在拘留营里面临饥饿。就在日本人计划处决我们之前不久，戏剧性地获救。这样的经历构成了丰盛的一生，一个充满神的良善和恩典的人生。

常常有人说：“你应该写本书！”我的标准回答是：“等我没有更重要的事要做的时候再说！”如今我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一些重要的工作我已经力不从心，看来是时候把这份见证记录下来，述说神的信实了。

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尽量少用“我”这个字，因为我不想当那种“专讲自己的人”。可是用第三人称来写，又好像有点拐弯抹角。如果这份见证有什么价值，尊贵和荣耀全都归给神。像保罗一样，我只能说：“我今天成为什么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要是我当初更顺服主的带领和能力，祂的恩典在我身上、借着我，本可以成就更大的事。啊，祂向我这样一个完全不配的人显明祂的爱和恩典，祂的忍耐和宽容真是奇妙！像古时的雅各一样，我要说：“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Gen. 32:10）。

多年前，我有幸和两位敬虔的主的仆人 Jansen 先生和 Jansen 太太在 Culion Leper Colony（麻风病人村）一起度过了一天。我感谢 Jansen 太太的好意和款待时，她说：“别感谢我，免得夺去了神的荣耀。”所以，我想对每一位读这个故事的人说：“请不要把任何功劳归给我们，免得夺去了神的荣耀。”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第 1 章

一切开始的地方

“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Prov. 20:7; 31:28）

Lingfield 是 Surrey 一个宜人的村庄，有许多古色古香的木结构老农舍。它在英国伦敦东南约25英里，在外人眼里唯一的看点就是一个赛马场。不过那里的热闹并没有打扰村里平静的生活，因为赛马场和火车站都在村外。村子中央有个池塘，我小时候以为“你可以把马牵到水边，却不能强迫它喝水”这句俗语就是从那里来的。街对面是铁匠铺，我们常常看得入迷，看人给马钉马掌。后来我要背 Longfellow 的诗“The Village Blacksmith”（乡村铁匠）的时候，就会想起那个魁梧的铁匠 Huggett 先生。我也知道他是 Mission Room 的主日学校长。

这个礼拜堂就在日间学校的后面，是1875年6月9日开始聚会的。主日早上，孩子们上完主日学离开以后，大人们就会聚在一起，静静地围着桌子坐下，桌上摆着主的晚餐用的饼和杯。长椅是给大人做的，靠背对一个小男孩来说有点高。他要么坐得笔直，要么就有从座位后面滑下去的危险。田野那边是圣公会的教堂。那里至今还保存着少数现存的“锁链圣经”之一。圣经刚开始印刷的时候，有些被锁在讲台上，免得热心的教区居民把它借走！十一点钟教堂的钟声一停，就会有一位弟兄站起来宣布开会的第一首诗歌。那些聚会中的敬畏和虔诚，给我留下了永久的印象。

夏天的几个月里，会在池塘边举行露天聚会。池塘的一头有一栋古老的石头建筑，在一棵大树的树荫下。这栋小房子叫“The Cage”（笼子），以前曾经是监狱。福音就是在那里传讲的，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在宁静的夏日傍晚，讲道人的声音会响遍整个村子。那时候没有车辆和收音机的噪音，根本不太需要扩音设备。在 Mission Room 聚会的地方教会里，积极参与的人当中有 Harry 和 Ellen Brooks。

1886年12月20日结婚的时候，Harry 25岁，Ellen 23岁。到了世纪之交，他们住在离村子大约三英里的一个叫 Felcourt 的大庄园里。Harry 是总园丁，他们的家是一栋爬满常春藤的圆形房子的一部分。他们有四个孩子。Ethel Annie 在1911年嫁给 Richard Weller 以后，住在加拿大西部；Florence Lillian 终身未婚，也去了加拿大，在 British Columbia 政府的农业部工作了25年；George Arthur Stanley 留在英国，从事园艺，有好几年负责一家大型种子公司。他的名字取自他的两个舅舅 George 和 Arthur，第三个名字则取自中非一位伟大的开拓宣教士 Frederick Stanley Arnot。隔了七年，第四个孩子才在1898年12月11日出生，取名 Cyril Harry。第二个名字当然是随我父亲，第一个名字则取自 Cyril Bird——一位1896年在 Angola 因发烧去世的宣教士。多年以后，我和他的遗孀以及她后来的丈夫 Andrews 博士成了很熟的朋友。

给儿子们取宣教士的名字，说明 Harry 和 Ellen Brooks 非常有宣教的心志。他们一度很想亲自去西班牙做宣教士，可是主没有开路。于是他们就在 Surrey 做宣教工作。有好几年，Lingfield 的洗礼是在 Mission Room 旁边田里的一个铁水槽里举行的。1901年，弟兄们齐心协力，在 Mission Room 里面建了一个洗礼池。Harry Brooks 就是帮忙建造的人之一。

翻看他1905年的小日记本——那是他在世上的最后一年——好像他常常在主日出去讲道，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去他骑自行车能到的一些小聚会。正是带着这样的宣教心志，他们在小儿子还没出生的时候，就把他献给主去做宣教的工作了。这件事我是在自己亲自回应了主的呼召以后才知道的。

当然，我对在 Lingfield 那几年的记忆很模糊。和父亲一起在花园里走，他给我一个熟透的小番茄，我一下塞进嘴里，番茄一咬破，满口都是那鲜美的味道！午饭后躺下休息，却偷偷从前门溜出去，姐姐们在后面紧追不舍。有一天母亲在烤面包，我一屁股坐在一个面包上，结果得重新捏好形状才能烤！我膝盖上至今还有一道疤，是摔了一跤留下的……第一次看见汽车。那一定是在秋天，因为我觉得好玩，看着落叶追着那辆车跑，车开得“飞快”——大概每小时20英里吧！

我们家附近有一棵树被砍倒了，锯下来的一段树墩放在厨房炉子旁边，成了我最喜欢的座位，特别是每天早上家庭灵修的时候。我还没学会认字，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圣经，跟大人一样。这样每天的家庭灵修，我一辈子都保持着。Mission Room 上午和下午都有主日学。不过，下午我留在家里陪母亲，听圣经故事，背圣经经文。Isaiah 53:6 很容易背，因为周围到处都是羊群。我知道它们是怎样各人偏行己路的。所以我小小年纪就知道，耶稣担当了我们众人的罪孽。我记不得有哪个时候我不相信这一点。

很多圣经教师和宣教士来过 Lingfield，在我们家吃过饭。我很快就明白了，小男孩在大人面前只能看、不能吵！这些人大多留着胡子，在我看来都是那么好的人。我以为老人家过好日子、不闯祸，一点都不难。我稍有一点不规矩，他们就皱起眉头，好像非常严厉。在我幼小的心里，父神就像这些人一样，我不敢向祂祷告。可是耶稣是我的朋友，祂爱我，为我死了，所以向祂祷告一点也不难。有一次，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听人家说，有人看见我骑在一个木头锯木架上，扯着嗓子唱一首宣教诗歌的副歌：“Speed away, speed away on your mission of light”（快快去吧，快快去吧，去完成你传光的使命）。

父亲1905年日记的最后一篇是10月24日，可是第二天，母亲写道：“他的44岁生日。在 Staffords Wood 的年度茶会，很美好，是他最后一次聚会。”这无疑很合适，因为他常常在那里讲道。之后他马上就病了，家里请来了 Austin 医生。这位好医生是聚会里的带领人，也是我们的知心朋友。我至今还保存着他送给父亲的一本书。后来又从伦敦请来了一位专科医生，做了手术。我实在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病。要是当时有现代的医学知识，他的生命也许可以延长。

11月30日星期四晚上，我进去亲父亲，跟他说晚安。第二天早上，母亲把我叫醒，说：“耶稣把爸爸接到天堂去了。”

他生病的时候，有人寄来一张卡片，上面只写了一句简单的话：“你们的父是知道的。”在母亲悲伤的时候，这句话给了她很大的安慰。她在日记里写道：“最亲爱的 H. 在耶稣里睡了。赏赐的是主，收取的也是主。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母亲告诉别人，在将近二十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之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气话。他们彼此相爱，但他们更爱主耶稣基督。

我听到一些大人说：“他太小了，不懂事。”我不记得自己掉过眼泪。我凭着孩子的信心，相信他真的和耶稣一起在天堂里。可是我还是很想念父亲，因为我知道他爱我。回顾我的一生，我明白在成长最关键的那些年里没有父亲，让我失去了很多。12月6日，就在我七岁生日的前几天，他被安葬在圣公会教堂附近的墓地里。那是一场双重葬礼，因为同时还有一位近亲也葬在旁边。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第 2 章

童年时光

“神在祂的圣所作孤儿的父、作寡妇的伸冤者。”（Psa. 68:5）

一个带着四个孩子的寡妇，在埋葬丈夫的第二天，就接到通知，要她搬出住了多年的房子，她该怎么办呢？当然，免费住那栋房子本来就是她丈夫在庄园工作的一项待遇。所以房主这样做是在他的权利范围之内。尽管如此，在这样的处境中，这位寡妇亲身经历了上面那节经文的真实。

两个女孩 Ethel 和 Florrie 都在外面帮佣。Ethel 在 Dorking 为 Scott 先生工作，他是基督教出版公司 Morgan and Scott 的合伙人之一。Florrie 在一户人家工作，她的表姐在那里当厨子。George 拿到了奖学金，在 Reigate Grammar School 住校。所以我七岁的时候，只剩下我一个人和母亲在一起。因为这样的情况，我不但没有父亲，也失去了平常姐姐和哥哥的陪伴。这几乎就跟寡妇的独生子一样。除了学校的同学，我没有什么玩伴。如果父亲还活着，生活一定会不一样，可是神从来不会出错。

我很害羞，胆子也小，身体也不太结实。有一天放学回家，一个贫民区的野孩子把我打倒在地。他觉得好玩，我可一点也不觉得！他还抢走了我的帽子。我很怕他，可是更怕没戴帽子回家。所以我远远地跟着他，保持一段谨慎的距离，直到他把我的帽子丢在一根门柱上跑掉了。

母亲那时四十出头，需要想办法养活自己，也要供养我。神又一次证明祂是“寡妇的伸冤者”。没过多久，她就找到了一份工作，给一位单身绅士当管家。A. C. Knight 先生是一家大肥皂制造公司的董事。他是基督徒，在 Congregational Church（公理会）聚会，很关心男孩子，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也是 Boy's Brigade（少年军）里一位积极的带领人。因此，我才可以和母亲一起住在他家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Knight 先生当了军官，在那场不幸的 Gallipoli 登陆战中阵亡了。那时候我们已经搬到加拿大去了。

1906年初，我们搬到了伦敦东南的郊区 Blackheath。Blackheath 和 Greenwich Park 之间有一大片荒地，是一块用来运动的空地。我对那个公园很熟悉，公园里有 Greenwich Observatory（格林尼治天文台），就是零度经线所在的地方，也是格林尼治标准时间的发源地。附近还有一个海军博物馆和泰晤士河。

我八岁生日前后，下了一场雪。主日学老师送我回家的时候问我："什么比雪还白？"这可真把我难住了！我想到各种白色的东西——写字的纸、糖、盐、母亲洗的衣服（她洗的衣服可从来不会发灰！）——可是雪比这些都白。母亲给了我一点提示，叫我往另一个方向去想。最后我终于明白了那首诗歌所唱的："用羔羊的血洗净我，我就比雪更白。"我可以信靠神的话："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Isa. 1:18）。我确信那时我已经得救了，因为我记不得有哪个时候我不相信耶稣为我死了。不过，我当时还没有完全的得救确据。

那时候很强调基督的第二次再来，我也学过关于被提的事。有时候，我从卧室的窗户望出去，看着灿烂的晚霞，心想基督会不会在天亮以前就回来了！可是有时候我又不那么确定。有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发现门锁着。母亲大概是出去买东西了吧。没关系！就坐在门口台阶上等吧。可是好像等了好久好久。接着冒出一个念头——也许主已经来了，我被撇下了！我怎么才能知道呢？有了！我就看看在我们这条街上走过的人。只要我看到一个我认为是基督徒的人（那当然得是我们礼拜堂的人！），我就知道主还没有来。就连那时候，我也已经被教导得很彻底了——什么"部分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被提”的理论，我从来没听过。让我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是，我看到的第一个基督徒，就是正走进我们家院门的母亲。

我时不时会因为没有得救确据而烦恼。有一个主日晚上（我记不得是什么时候了），我下定决心要解决这件事。也许是因为讲道人在聚会中说的什么话，我实在记不得了。总之，我跪下来像平常一样做睡前祷告的时候，加了一句话：“主啊，如果我以前从来没有真正信靠过你，那么我现在就相信你，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马上就确知自己真的得救了，而这份确据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我以前无疑已经真正得救了，但需要那个明确的行动来让我确信。后来我才明白，得救的确据不是建立在我们的感受上，而是建立在神话语的应许上。

离我们在 Blackheath 的住处大约四分之一英里，有一个 Alexandra Hall。那里的聚会在某些方面和别处不太一样。大多数成员都是上流社会的人，穷人只有少数几个。有一个女人是做杂工的，说话很直，也很粗鲁，常常毫不客气地嘲讽那里某些太太的势利。母亲的服事是去关心一些老太太，而对这样的客人，我可一点也不热衷！她也很关心那些离家在外帮佣的年轻女子。

我们刚搬到那里的时候，Alexandra Hall 的会众相当多。每个主日早上大约有两三百人聚在一起守主的晚餐。有一位 Luck 弟兄总会读一章圣经，不加任何讲解；复活节主日那天，一定是 Luke 24。晚上的聚会大约会有五百人。Robert McKilliam 博士是聚会公认的带领人，只要他在家，总是由他讲道。他虽然是学医的，却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圣经研究者，还是一份月刊“The Morning Star”（晨星）的编辑，那份刊物特别强调主的再来。诗班大多是年纪大的人，坐在讲台上。有一位先生有他最喜欢的座位，就在栏杆旁边，讲道的时候他会靠在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栏杆上，美美地打个小盹。

这个聚会不论冬夏，在晚上聚会之前，都会在门前台阶上举行一个15分钟的简短露天聚会。夏天，晚上聚会结束后，还会在镇中心举行露天聚会。后来人数越来越少，他们就办了一次布道会。请来的讲员是一个叫 Hodson 的怪人。他对主很火热，又有幽默感，反应也特别快。听说有一次，他在英国一个村子里搭帐篷办布道会。主日早上，他去圣公会教堂听牧师讲道。他对那篇讲道非常失望，就问牧师："你管这个叫传福音吗？"好像是为了报复，这位牧师大人说服了村里两个流氓，去揍 Hodson 先生一顿，再把他的帐篷烧掉。那两个人在帐篷前拦住 Hodson 先生，说明了来意，他却是个人高马大的壮汉，把他们一个一个拎起来，扔过了树篱。那位一直站在远处的牧师走过来，傲慢地问："Hodson 先生，你管这个叫传福音吗？"Hodson 先生回答说："不，我管这个叫赶鬼！"

聚会人数减少，部分原因也许是 Alexandra Hall 没有主日学，年轻人也很少。我们离开以后，McKilliam 博士去世了，这让聚会更加衰落。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在服役期间，有一天晚上去 Blackheath，发现大约只有二十位信徒在一个小得多的会所里聚会。

因为那里没有主日学，主日下午我就去 Lewisham 一个治安不好的地区上主日学。我的好朋友 Willie Peacock 和我一起去，我们的老师是一位很好的人，Bernau 先生。在那个贫民区里，窗户都装着粗粗的铁丝网保护着。几乎每个星期都有调皮捣蛋的男孩因为闹事被强行赶出去，可是到了下个星期，他们总是又回来了。

我在 Lingfield 开始上学，父亲去世前，在小学读了一年左右。我们搬到 Blackheath 以后，我去了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Lea Green 的 Northbrook School，单程要走20分钟。那时候根本没有校车这种东西。我喜欢那里的老师，却非常不喜欢校长。在我看来，Fluke 先生的名字取得很贴切：首先，他抽烟！有一天在课堂上，他误解了我的一个回答（我怀疑是故意的），在全班面前取笑我。这好像是因为我作为基督徒的立场，虽然那立场还很软弱。有一次放假，我在等着理发。Fluke 先生进来了，抢在我前面坐上了理发椅，还对理发师说了几句挖苦人的话。

有一天下午放学回家，我的两个同伴中有一个在路边水沟里捡到一个干瘪的土豆。它看起来软软的、很有弹性，我的伙伴说："不知道它能不能弹起来！"我们一点也没浪费时间去琢磨一个老土豆的"弹性"，也不管周围是什么环境。在一个三条街交汇的繁忙路口，我的伙伴把土豆往地上一摔。哎呀，它弹起来了吗？弹起来的土豆正好打在迎面走来的一位老太太的帽子上，要不是有带子系着，帽子早就被打掉了。（那时候矮小的老太太们都戴一种软帽，前面在额头上方高高翘起，用带子系在下巴底下。）我瞥见有几只手举起来去扶帽子，还听到一声尖叫。我们可没有留下来听她痛骂那个"现代社会"里的少年不良行为。三个男孩往三个不同的方向逃之夭夭，那速度要是被记录下来，肯定可以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后来我转到了 Greenwich Central School，相当于高中。从家里走过去要45分钟，可那时候我们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那里的校长 Wood 先生很严格，但很体谅人，很受尊敬。星期一早上的晨会专门用来读经和祷告。这些学校都是男校；那时候还没有男女同校的。每个星期一早上，两个班长要早点到，把课桌上所有的墨水瓶都灌满（那时候还没有钢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笔或圆珠笔这种东西!）。有一天早上，我和同学端着一盘墨水瓶下楼梯，一个迟到的同学冲上楼来，跟我们撞了个满怀。在下一次晨会上，校长尖刻地说了几句，批评那些把墨水溅得满楼梯都是的粗心男孩!

不知怎么的，我总算没惹什么麻烦，所以从来没有因为不守规矩被送到校长办公室去。要是在他的黑名单上被记一笔，离校的时候就拿不到推荐信了。1912年4月25日他写的评语，我怀疑自己是否配得：“他的进步非常令人满意，他离校时已经赢得了同学和老师们的敬重。”这封推荐信是在我离开那所学校去加拿大前不久写的。我离开的时候，老师和全班同学还好心地送了我一份钱作礼物。

童年时光里记忆最深的是暑假。母亲和我通常会去探望她的亲戚，因为她的亲戚很多，所以每年夏天都去不同的地方。母亲的家族大到她最小的妹妹一出生就已经当上姨妈了。

Cromer 是英国东海岸的一个海滨度假胜地。有人往我手里塞了一个日本灯笼，让我参加提灯游行，结果我得了第三名。可是没过几天，我那点得意劲儿就烟消云散了。我在沙滩上挖沙的时候，一只鞋被埋进沙里弄丢了。挨了母亲一顿骂，还得光着脚走回家，真是丢脸极了。

母亲的一个哥哥住在南威尔士的 Cardiff，在干船坞工作。看到船停在干船坞里，我觉得太神奇了。我的一个表哥也在那里工作，后来掉进干船坞摔死了。有一天，我们坐游船横渡 Bristol Channel，去游览像 Clovelly 那样风景如画的地方。这个在 Devon 的小地方那时候只能坐船去，房子就建在海边陡峭的山坡上。我们在 Ilfracombe 停下来吃午饭，对一个男孩来说那顿饭真是难忘——烤羊肉配新土豆（和一小枝薄荷一起煮），还有新鲜的青豌豆。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甜点是一盘覆盆子，上面浇着 Devonshire cream，一种非常浓稠、香醇的奶油。

Littlemore 是离 Oxford 几英里的一个村子，母亲就是在那里出生的，她的大哥在那里开了一家铁匠铺兼马车铺。看他们怎样给木头车轮装上铁圈，真有意思。我们坐一条小船，穿过泰晤士河上游的几道船闸，去参加在 Harcourt 伯爵的大庄园里为当地居民举办的游园会。还有一天，我们去逛了 Oxford University，不过从那所著名的学府里，我们可是一点学问也没吸收到。

有一年夏天，母亲和我各去各的地方，我住在 Ethel 的未婚夫 Weller 一家。那时候我还没见过假牙。Richard 晚上睡觉前把牙齿拿出来，让我惊讶极了，他后来成了我的姐夫。我发现我的牙齿是不可能拿下来的。六十年后，1969年，我和 Anna 去探望 Rich 两个还在世的姐妹，她们还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她们自然是老了，可那栋房子好像一点没变。

母亲最小的妹妹 Millie 阿姨住在英国南岸面对英吉利海峡的 Folkestone。她丈夫是退伍军人，他们有两个女儿，和我年纪差不多。有一次我们去那里的时候，红十字会和救护队正在举行一场演习。他们找一些男孩自愿参加，答应给六便士。我们被卡车拉到城外，叫我们分散躺在一片草地上。他们在我们身上挂上标签，写着我们假装受了什么样的伤。然后护士们过来给我们包扎，再把我们送回学校，学校就当作医院。很多男孩是“能走路的病人”。他们头上缠着绷带，或者胳膊吊着吊带，得自己走回学校。我是伤得比较重的，运气好，被放在担架上抬了回去。家庭主妇们看见这一队伤员，不知道是在演习，都跑出来同情这些遭了意外的可怜人。为了她们，我在这种情况下尽量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到了“医院”，一顿柠檬汽水加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饼干的治疗，带来了一些“神奇的痊愈”，于是绷带都拆掉了，我们就被打发回家了。

母亲认为，在加拿大这样年轻的国家，我会有更好的机会。那时候我还不关心世界大事，可是已经有人在谈论要和德国打仗了。我姐姐 Ethel 在1911年6月1日结婚，第二天就动身去了 Alberta 的 Edmonton。一年后，母亲、Florrie 和我也要跟着去。George 第二次拿到奖学金，进了 College of the 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ty（皇家园艺学会学院），所以决定留在英国。

十三岁那年，受洗的事提上了日程。Alexandra Hall 没有洗礼池，我也不知道那里的聚会对洗礼持什么立场。不过，我还是战战兢兢地去找 McKilliam 博士面谈。他和我谈起我对基督的信心，非常和蔼。于是在离开前不久，我被 Alexandra Hall 接纳进入交通。他们安排我在 Lingfield 受洗，就在我父亲帮忙建造的那个洗礼池里。那是1912年5月7日，对我来说是非常喜乐的日子。主把 John 13:17 印在我心里：“你们既知道这些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所以，我虽然很紧张，心里也很喜乐。关于洗礼，有很多我还不明白，可是我知道这是主要我去做的事。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对宣教的故事已经非常感兴趣了。我不记得 Alexandra Hall 有多少宣教的热忱，可是我不止一次走路去 Greenwich 的 King George St. Hall 听宣教士讲话，特别是从非洲回来的宣教士。最让我兴奋的事情之一，就是1911年10月被允许去参加在伦敦举行的年度宣教大会。那时候大会在 Devonshire House 举行，晚上的聚会挤得满满的。我坐在楼座的一级台阶上，听 Dan Crawford 讲话，那是他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回国休假。

我受洗几天后，5月16日，我们从 Southampton 坐上 Cunard 公司的一艘船 S.S. Ausonia 出发，那绝对不是他们最好的船。我们跟着一个移民团一起走，这个团是 Salvation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Army（救世军）安排的，大多是妇女。出海的第一天早上，我是少数几个敢去吃早餐的勇士之一。统舱的菜单是爱尔兰炖肉或者煮鸡蛋。早餐吃爱尔兰炖肉——想都别想！那炖肉也一样别想！所以我吃了两个煮得很老的鸡蛋，很快就后悔了！我晕船晕了一个星期，好多年都不碰煮鸡蛋。多年以后，我们从好朋友 George Maslen 那里得知，他坐的是 Ausonia 号的上一趟航程。伙食糟糕透了，统舱的乘客差点闹起暴动来！

到了大西洋中间，我们四周都是冰山，船走得非常小心，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就在一个月前，Titanic（泰坦尼克号）刚刚沉没。我还记得新闻标题："不沉之船沉没了。"这艘船建有水密舱，理论上是不会沉的。它在处女航时载着许多名人，撞上冰山，几百人丧生。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一路平安。

主日晚上在 Quebec 上岸的时候，钟声当当地响着。我以为是教堂的钟声，后来才发现每个火车头都有一个钟，前面还有一个排障器。我们坐了好几天的火车到 Calgary。火车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停下来换火车头和乘务员，乘客们就疯了似的冲进车站餐厅，赶快吃点东西。那里的火车和英国的火车很不一样，也和今天坐火车的情形很不一样。

我们在 Calgary 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再往北去 Edmonton。救世军把我们带到他们的会堂，那里正在开见证会。那里的好几位成员把我们接到他们家里过夜，他们真是太好了。有一个人讲他得救的新喜乐时，他的见证让我觉得挺好笑。他高兴得在讲台上跳上跳下，一边揉着肚子一边喊："我这里面感觉真好！"想起一个星期前晕船的痛苦，我有点不太恭敬地跟我姐姐小声说："他要是上个星期跟我们在一起，就不会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觉得那里面这么好了。”但愿他得救的确据不只是建立在身体的感觉上。

第二天坐火车，我们到了 Alberta 的首府 Edmonton，那时候它更像一个正在发展的边疆小镇。我姐姐和姐夫在那里迎接我们。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第 3 章

在加拿大的生活

“祂又领他们行走直路，使他们往可居住的城邑。”（Psa. 107:7）

在加拿大的生活在很多方面都很不一样。离开英国之前，我得意洋洋地拥有了我的第一顶（也是唯一一顶）圆顶礼帽，那是非常典型的英国绅士帽。没过多久我就明白了，在加拿大，一顶圆顶礼帽很快就会成为靶子，招来的可不只是嘲笑，还有更硬的东西。

我们在 Edmonton 的家是两顶帐篷，地上铺着粗木板，四周也钉了木板。一大块帆布盖住两顶帐篷，进一步遮风挡雨。一顶帐篷当客厅、饭厅和厨房，女士们睡在另一顶里。一个小木棚是我和姐夫的卧室，一直用到冬天来了。然后我们搬进了起居的那顶帐篷，睡在厨房炉子旁边的桌子上。那个小木棚就成了冷藏室，用来放大块的牛肉和猪肉。有一天，我姐姐去小木棚里切肉。她没多想，就把钥匙放在嘴里含了一下。在那样的严寒里，钥匙把她嘴唇上的皮都粘掉了。还有一天她在大街上走着，一个男人拦住她说：“对不起，你的鼻子是不是冻僵了？”她自己根本没发觉！

我们住在 North Saskatchewan River 旁边的河滩上，所以附近就有流水。夏天我们还找到一些可以吃的浆果，给饭桌添点花样。冬天，我们得在两三英尺厚的冰上凿个洞才能取水。就在我们帐篷的下游，正在修建连接 Edmonton 和 Strathcona 的高架桥。冬天，冰上搭了很多脚手架。到了春天，冰层开裂，开始往下游漂。像房子侧墙那么大的冰块一块压着一块翻倒，把前面的一切都卷走了。冬天早些时候，人们把冰切成块，存放在大仓库里，留到夏天用。

那时候我们手头很紧，所以一到 Edmonton，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我们就得找工作。Florrie 找到了一份帮佣的工作，母亲则做些零星的护理工作。那年夏天，Ethel 生了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叫 Beatrice（Tricie）。Ethel 的丈夫 Richard 在英国是油漆匠，可是在加拿大不得不做各种不同的工作。我十三岁，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珠宝店当跑腿的。这份工作还包括当清洁工。星期六晚上，店要开到十点。有一个星期六晚上我回家的时候，下起了一场可怕的雷雨。下了电车，剩下的路我走回去，经过正在建造的新 Alberta 议会大楼，又经过一座古老的 Hudson's Bay 堡垒。闪电的间隙里，什么也看不见。路往右拐，要下一个坡才到河滩。要是我错过了那个拐弯，就会从陡峭的路堤上滚下去，摔到下面的铁轨上，那可能会摔断骨头，甚至送命。我在黑暗中摸索着往前走的时候，一道耀眼的闪电划过。就在我面前，就是路堤的边缘。我走下山坡的时候，心里知道主在看顾着我。

那个夏天我换了一份又一份工作。珠宝店老板不满意，把我解雇了。对我来说，这真是个沉重的打击。可是后来，聚会里的一位姐妹给了我一份工作，在她拥有的一栋公寓楼的地下室里给水管包上保温层。对我来说，这份工作在做的时候是份好工作；对她来说，这是廉价劳动力！在展览场举行年度博览会期间，我在一家餐馆当收盘子的杂工，活很累，但吃得很饱。接着，我在一家服装店当跑腿的。店是一对夫妇经营的，两个人整天吵个不停。我夹在他们中间挨炮火，实在受够了，就辞职了。

后来，我去 Canadian Pacific Railroad 当电报投递员。我没有自行车，但我跑得快，城里所有的空地和近路我都知道。我发现别的男孩都不愿意跑早上去城西的那一趟，就主动揽了下来。议会大楼的办公室陆续开张，所以那里总有很多电报要送，而且地方都挨在一起。我们是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按送了多少封电报来算工钱的。跑那一趟，我还可以先回家吃午饭，再回办公室。我平均一天挣一块钱，在那时候算是不错了。在一家干净的餐馆里，25分钱就能吃一顿丰盛实在的饭！有一天，我捡到一张一家更好的餐馆的餐券。人们会一次付一笔钱，打折买一张这样的餐券。这张餐券上大部分的格子都还没有打孔。我已经在幻想着吃一顿顿美味大餐了——还不要钱。中午，我往那家餐馆走去。怪了！中午里面一个人都没有！接着，门上的一块牌子映入我的眼帘："已停业。"我学到了，在这个世界上，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个世界所给的，很多正是这样——苦涩的失望和落空的应许。

冬天很难熬。滑冰的机会多的是，可我天生不擅长运动，始终没学会滑冰。有一天晚上下着暴风雪，我护送母亲下班回家，气温是华氏零下30度。我们在雪地里艰难地往前走，我心里直犯嘀咕，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走到家。还有一天早上，在河边那一带，气温降到了零下52度。我常常在回家路上顺便到 Fort 去取我们家的瓶装牛奶。牛奶冻住了，瓶盖被顶起来，搁在高出瓶口一英寸的冻牛奶上。有一天傍晚，我两只胳膊各抱着一瓶牛奶。走到路上一个小坡的地方，两只脚一下子往前滑了出去，我重重地一屁股坐在地上，疼得要命。牛奶是保住了，代价是摔得挺疼，还费了好大劲才爬起来。

我常常希望能去一个一年到头都是夏天的地方。倒不是说我真指望这个愿望会实现，因为那时候我根本想不到，我这一生大部分时间会在热带度过。那段日子我的属灵光景不太好。我是个软弱的基督徒，不光是因为年纪小，主要是因为没有人教过我怎样以神的话语为粮食。我们按时参加聚会，可是年轻人不多。因为聚会里的光景很可悲，年轻人也得不到什么帮助。我们到 Edmonton 后不久，聚会的会堂搬到了新地方。眼看着那样一座房子沿着街道慢慢被挪过去，真是件新鲜事！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聚会里分成了两派。有一位年长的弟兄，会堂就是他的，他有几个朋友，对和其他信徒交通的事看法非常死板。劳动节那天有一个特会，来了很多人，其中有不少讲道人。两派各自邀请了支持自己观点的讲道人。讲台是开放的，没有事先安排好的程序。那天下午天气很热，大家挤在一座租来的房子里聚会，有一位弟兄没完没了地讲个不停。要是在政治上，这就叫"冗长发言拖延战术"。他是想霸着讲台，不让一位在交通问题上看法比较开放的讲道人上台。最后，一位曾在大草原上为主开拓工作的老弟兄站起来，读了 1 Corinthians 14:30，告诉讲员他应该让位给其他弟兄。

那件事过后不久的一个主日，有人宣布聚会接到通知，要搬出会堂。可是会堂的主人已经私下叫他那几个亲信留下来。就这样，聚会分裂了，留下了许多苦毒和怨气。那样的气氛、那样不像基督徒的心态，对一个像我这样的年轻信徒的属灵成长实在没有什么好处。

那些年，太平洋沿岸兴起了房地产热。中介们大力吹捧 British Columbia 的好处。那确实是一个美丽的省份，但中介说的话并不都可信。有几位朋友听信了天花乱坠的介绍，很便宜地买下了农地，后来才发现他们的农场是在一座陡峭的山坡上！不过，我们还是决定离开 Edmonton，搬到气候温和一点的地方去。1913年4月，我的姐夫 Richard 先到了 Vancouver Island 南端的 Victoria。一个月后，我们其余的人也跟着搬进了他买下的那座小房子。在 Oaklands 区，离一所新学校不远，我们遇到了很合得来的邻居。在我们住的那个街区里，十户人家中有一段时间有九户住着聚会里的信徒。隔壁是一个曾在南印度事奉主的宣教士家庭。他们家有两个男孩比我大一点，我和 Frank Maynard 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靠着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另一位邻居的帮忙，我在一家大百货公司 David Spencer's 找到了一份工作。

就在我们到达之前不久，Oaklands 区成立了一个新的聚会，是从市中心的大聚会 Victoria Hall 分出来的。他们那时在 Hillside 和 Cedar Hill Road 拐角处一些商店楼上租了个会堂聚会。有一天晚上开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几个男孩看见路那头大约一英里外有个谷仓着火了。我们心想，弟兄们怎么还不散会，好让我们冲出去看火！

1914年，Oaklands 聚会在他们聚会地点的隔壁买下了一块地，开始盖房子。很多活儿都是义工做的。我也把一些空闲时间花在这个工程上。那年8月，Frank 和我放假，决定徒步走一段 Vancouver Island。战争的乌云正在逼近，可那时我们一点也不在意。第一天下午，我们就开始爬 Malahat。今天的 Malahat 是 Victoria 北边一条风景优美的公路。那时候它却是一条单行的碎石路，只在这里那里有些地方让偶尔经过的车辆错车。那段路很陡，有几个人夸口说他们能用高速挡开上去。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天快黑了，我们开始找个合适的地方露宿过夜。一位开着敞篷 T 型福特车的司机让我们搭车。Frank 爬上前座坐在司机旁边，我爬到后座的一堆行李上。接着，那司机就带我们来了一趟我这辈子最惊险的车程之一。上坡下坡，沿着悬崖边的碎石路转弯，他一点都不减速，一直开到 Duncan 一家酒馆门前才停下来。他保证几分钟就出来，只是进去喝点酒给自己壮壮胆。又开了几英里，他在 Horseshoe Bay 的酒馆又停了下来。我们决定不再拿自己的性命冒险，坐这样一个司机的车了。反正天也黑了。于是我们离开大路走进林子里，用松枝和蕨草铺了张床，裹着毯子蜷着睡了。

第二天，我们又往北走了几英里，然后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原路折返。Frank 在 Cobble Hill 有一位朋友，我们在他那里愉快地住了两天，划船、游泳。从那里我们去了 Shawnigan Lake（那时那里只有很少几座房子），在那里住了一夜之后，经由 Sooke Lake 徒步走到 Goldstream。那条小路很荒僻，却非常美丽。我们一整天没见到一个人，却看到了熊和美洲豹的脚印。

就在我们徒步旅行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工作的那家百货公司夹在两家报社中间。最新的战况公报就贴在橱窗里，所以人们会停下来看看战争的最新消息。我那时才15岁，对这些事不太关心。

我的基督徒生活很表面；我还是没有学会以神的话语为粮食。去聚会、上主日学，夏天到市中心参加露天布道会，这就是我全部的属灵活动了。可是我既没有真正的属灵成长，也没有为基督作清楚的见证。我得救了，却没有受到挑战，或者说，就算有挑战，我也置之不理。

到了1915年，号召男人自愿参军的呼声越来越急迫。我其实并不想去海外，我的家人当然也一点都不鼓励我有这样的念头。聚会里对服兵役的事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参了军，另一些人则站在良心反战者的立场上，并且为这个立场受了苦。有一位弟兄非常直言不讳地批评那些入伍的弟兄。在我看来，他的批评没有什么分量，因为他自己靠制造军需品赚着不错的工资。造子弹和开枪打子弹，又有什么区别呢?

真正吸引我的，是有机会加入一个守卫太平洋海岸的本地军团。这个军团属于加拿大正规军，和准备开赴海外的加拿大远征军不一样。这样我能比现在多赚一点钱，而且驻地离家很近。另外，我也有一种年轻人想离开家、见识一下另一种生活的愿望。我根本没想过要为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这样一步祷告，也没想过要求问主的旨意。

我把年龄从16岁改成18岁，这是不诚实的，可我给自己找理由说这是为了国家。征兵军官巴不得凑够他们的名额，而我的个头又比同龄人大。就这样，我成了皇家加拿大要塞炮兵（Royal Canadian Garrison Artillery）的一名列兵，驻扎在 Signal Hill，从那里可以俯瞰 Esquimalt 海军基地。因为是正规军，除了普通军装以外，我们还发了礼服。我穿上那身鲜红的礼服，心想主日休假的时候一定能给年轻姑娘们留下点印象。那些为上战场受训的部队没有这样的军装，他们反倒向我的军装敬礼，以为只有军官才敢穿这么气派的衣服。几个月后，我升为一等兵，得到了我的第一条杠。这让我骄傲的成分多过让我能干的成分。我在主的事奉上当然做得不好，也不是耶稣基督的好精兵。回头看，我真惊叹祂的恩典——我本该被开除出祂的队伍，而且是不光彩地开除。我们奇妙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祂的恒久忍耐真是何等奇妙！

我驻扎在 Signal Hill 的那个冬天，对 Victoria 来说是出奇地冷。平常一整个冬天只下几英寸的雪，可那年一场暴风雪就下了大约三英尺。雪开始下的时候我正在城里，不久电车就停了。这就意味着我得在一两英尺深的新雪里跋涉三英里。第二天，部队被叫出来帮忙清理街上的雪，不过不包括我们的军团。Victoria 因为海鸥的缘故，有一句出名的旅游口号：“跟着鸟儿到 Victoria”。那年冬天，鸟儿都饿坏了。有几个弟兄把肥腊肉块绑在一根绳子的两头，看着两只飞鸟互相拔河，觉得挺好玩。

我们有一个号手负责吹号。每天早上，在集合前半小时要吹一次号，可他从来没有及时穿好军装，所以他就打开一扇窗户，把号伸出窗外吹。有一天早上，有个家伙爬上了屋顶，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手里拿着一壶水，就在号声刚响起来的时候，把水灌进了号里。号声在一阵咕噜咕噜、噗噗噗的声音里断了气，大家都乐坏了！

大家越来越多地谈论去海外的事。有些人开了小差，去加入那些要开往欧洲参战的部队。我非常愚蠢地和一个好朋友约好擅自离队。我们到了 Vancouver，报名加入了一个要去法国的工兵连。我们甚至还回到 Victoria 向家人告别。可是等我们回到 Vancouver，就被宪兵逮捕，送回去受军事审判。我们被判在军事监狱里关30天。有一天晚上，我在那里拿起圣经，读了 Psalm 51，跪下来向主认了我的罪。过了一两天，我们的指挥官提出，如果我们愿意自愿加入炮兵连派往海外的一支分队，就可以免除我们的刑罚。我被放出来以后，请求家人原谅我，也去向聚会里的几位长老认罪。这是我年少无知时的一段荒唐事，我真想把它忘掉，但我得到安慰，因为神赦免的时候，祂也就忘记了。在这里把它写下来并不是什么愉快的事，只是它确实显出神的恩典何等大。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第 4 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

“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Rom. 6:21）

这个问题的答案再明显不过了！一点也没有！要不是我们恩慈的主在我服役那段日子里有奇妙的良善和慈爱，那些年真不如蒙上一层面纱，不提也罢。世上最不快乐的人之一，就是不为神而活的信徒。他从基督徒的生活中得不到喜乐，因为他悖逆的时候，就和他的主失去了交通。他也没法从世界得到什么快乐，因为他良心有愧，圣灵又在他心里作工。我就是那种软弱又可怜的基督徒之一，做了许多我现在觉得非常羞耻的事。

几年以后，主恩待我，把我挽回到祂自己那里，那时我在约珥书的预言里得到了很大的安慰。虽然这段经文的解释是指以色列说的，但其中有一个应用是我可以领受、也确实领受了的。“蝗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Joel 2:25）。前面一章讲到蝗灾造成的浩劫和毁坏。要是根本没有蝗虫，那该多好啊！然而，赐诸般恩典的神已经补还了蝗虫所吃掉的。虽然我确知自己已经得救，我却是个软弱的信徒，软弱到身边的人都不知道我是信徒。

军方决定从皇家加拿大要塞炮兵中组建一个炮兵连。于是我成了从西海岸派出的分队中的一员。我们走了3000英里的路程，横穿加拿大，从西边的太平洋到东边的大西洋。在 Nova Scotia 的 Halifax，我们和其他部队派来的分队会合，驻扎在 Citadel。这是一座老堡垒，建在山顶上，可以俯瞰全城和 Halifax 湾。我的一个战友有个哥哥在海军，负责那里的一艘汽艇。我们有一两次坐着那艘汽艇在港口里兜了一圈。那是一个宽阔的港口；其实它是两个港口，中间由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一条狭窄的水道连着。几个月后，我们在法国的时候，一艘弹药船在那条水道里和另一艘船相撞。结果发生的大爆炸把这座城市的一大片都毁了。

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有一天夜里被叫去码头救火。我们冲下山，穿过城镇，跑到码头。有一艘船着了火，可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救火的设备。有一个人被困住了，想从一个舷窗里钻出来。还没等人拿来割炬把洞割大一点，他就死了。我常常想，为什么船上的舷窗不做得大一点呢。

主日早上的教会列队是强制的。我们的上校建议，全连每个主日列队去一间不同的教会，而不是分成小组各自去自己选的教会。因为我在 Halifax 不知道有什么聚会，我就跟着去了。大家常拿这件事开玩笑：那天早上牧师欢迎炮兵连来到他们当中以后，接着就会宣布："现在我们收奉献。"

我们的吉祥物是一只巨大的纽芬兰犬。我们登船横渡大西洋的时候，它跟着我们一起走过码头，可是不准它上船。这只狗可不打算被留下。半夜里，等一切都安静下来，它就走上了跳板。那个独自站岗的哨兵拦不住这么大的一只狗，它就偷偷上了船。它在英国检疫期满出来，刚好赶上炮兵连渡海去法国，又归了队。我们第一次投入战斗的时候，这只吉祥物不见了，后来我们听说有人在前线看见过一只大狗。

在英格兰南部，我们为了不同阶段的训练被调到不同的营地。偶尔我能请到周末假，去看望我的哥哥和嫂子，还有我们的一些老朋友。在隆冬时节，我们在 Lydd，那是南海岸一个荒凉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受训学习修建炮位。有一天夜里，地上有雪，我想跳过一条我以为很窄的小溪。人还在半空中，我就发现它比我想的要宽！我掉进冰里，冰冷的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水一直没到我的屁股！真是让人倒抽一口凉气的发现！不过也有好处——我奉命回营房喝热汤、换干衣服，接下来的勤务也都免了。

在 Salisbury Plains 的最后一个营地，我们领到了大炮——六英寸（155毫米）榴弹炮——还有其他装备，包括前一年才开始使用的钢盔。有个小伙子戴着钢盔走进营房。门后站着另一个士兵，手里拿着一把推式扫帚，照着钢盔就"砰"的一声砸了下去。他差点把那家伙打晕，却辩解说："我只是想看看这玩意儿到底有多结实！"

我们坐一艘臭烘烘的货船，连夜从 Southampton 到了法国的 Le Havre。这艘船上一趟运的是马和骡子，这些牲口常用来把补给运到前线。好像根本没有人费心事后打扫一下。在 Le Havre 待了不久，我们就坐着闷罐车往北开到前线。我们的大炮刚好及时就位，赶上了1917年复活节主日 Vimy Ridge 战役的开场炮击。我们的位置很靠后（这对我们这些新兵蛋子倒挺合适），德军很快就被打退到我们的射程以外。从 Vimy Ridge 可以俯瞰 Lens 的煤矿区和 Douai 平原。天气晴朗的时候能看见 Douai，罗马天主教的圣经译本就是在公元1609年在那里出版的。加拿大步兵很快就把德军赶下了山岭，并向前推进到远处的平原。他们本来大概可以突破德军防线，一路打到 Douai，可是将军们没有准备打运动战。在他们看来，这是一场阵地战，两军在战壕里面对面地对峙。没过多久，能走路的伤员就三三两两地退回到我们所在的村子。我从其中一个人那里得知，我的好朋友 Frank Maynard 在那天早上的进攻中阵亡了。这对我是个很大的打击，因为我还盼着很快能再见到他。

1917年夏天，我们驻扎在 Vimy Ridge 北端的一个村子里，经历了不少战斗。德国飞机打下我们的观测气球，一架受了伤的飞机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从我们头顶上掠过去迫降，还有空战，那些飞机在空中翻滚、绕圈。有一天，我们看见一架红色的飞机，我们猜那可能就是德国有名的王牌飞行员“红龙”，Baron von Richtofen。我看到我们今天的飞机，就会想，他们那时候开的那些玩意儿怎么不会散架呢。

我当通信兵的工作主要是修理和架设大炮和指挥部之间的线路。在两年的战斗中，我一次都没开过任何一种枪炮。我们住在一座被毁房子的地下室里。有一天，我们在邻村看到一个炉子，是从一座房子里拆出来的，显然是要送到哪位军官的食堂去的。那天夜里，我们就把它“弄”来自己用了。有一天晚上我借着煤油灯的光看书，我的战友把灯碰翻了。我跳起来扑打床上煤油烧起来的火。我的战友哈哈大笑说：“看看你的头发！”我看不见自己的头发，但我用手使劲搓，要把头发上蹿起来的火苗扑灭。他觉得那场面太好笑了！幸好除了免费烫了一下头发，没有什么损伤；烧的只是煤油而已。过了不久，我就扯平了。有一天他说：“我闻到有东西烧焦了。”我笑着回答：“是啊，是你的小胡子。”他把香烟抽到只剩短短一截烟头，把他的小胡子都烤焦了。

我们刚到那个村子不久，有一天中午轮到我去伙房领饭。伙夫们待在一座被毁的房子里。因为我正忙着干一件活儿，我从 Victoria 来的一个好朋友就主动替我去了。德军显然一直在观察人们在那个地方聚集。那天，一颗炮弹打中了伙房，炸死了我们七个弟兄，其中就有我的那个好朋友。另一个从 Victoria 来的人在那次失去了一条腿。我明白了，虽然我不配，神还是在看顾我。

就在那天下午，我们两个通信兵奉命陪一位中尉去一个前沿观测哨。我们要走的那条路是法国那种坚硬的鹅卵石路，德军每分钟就往那条路上扔一颗炮弹。我们的中尉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好像压根没想过要绕道走。我们就上了那条路。一颗炮弹落下来，弹片从头顶飞过，我们背着装备拼命地跑。接着又听到另一颗炮弹呼啸而来！我们一头扎进路边的一条战壕里，躲过了它的弹片。然后又爬起来接着跑。我们已经很会凭炮弹的声音判断它有多大、大概落在哪里。慢悠悠的嗡嗡声可以不理会，可是突然一阵呼啸就不行了。问题是，炮弹来得越近，留给你的预警时间就越短。

九月的一天夜里，德军用小炮弹轰击村子。我们管它们叫“嗖砰弹”，因为先是“嗖”的一声，接着就是“砰”的一声。其中还有一些毒气弹。毒气会沉到低洼的地方，所以我们避开沟渠和弹坑。我们有防毒面具，但很少用。戴着它根本没法通过话筒通话，眼罩又是云母做的，很快就模糊了。（那时候透明塑料还没有发明出来呢。）我们的很多线路都断了，所以我们整夜都在外面修通信线路。

天亮以后炮击停了，那是一个阳光明媚、晴朗美丽的早晨。在休息之前，Martin 和我自愿去伙房领当天的口粮。回宿营地的路上，我们快走到村里的主要路口了。我们听见一颗大炮弹尖啸着飞过来，又快又近！我扑倒在地，紧贴在路面上，炮弹落地，弹片四飞。后来我发现，有一小块像半颗豌豆那么大的弹片穿透了我马裤上的皮补丁，只是轻轻擦破了一点皮。我庆幸自己没被打中，跳起来招呼 Martin 快走。他脸朝下趴在路上，一动不动。我把他翻过来——一块弹片钻进了他的胸口。他的军装已经被血浸透了。我赶紧跑去找人帮忙，但我知道已经没用了。他是个宿命论者，又爱冒险，所以我猜他连扑倒都没有试一下。有好一阵子，我的神经都垮了。主又一次恩待我，救了我。可我还是没有改变我的行为。说来奇怪，却是真的：怕人的心常常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比敬畏神的心更能抓住我们。

那件事过后不久，我们被调往北边比利时的大教堂之城 Ypres。大教堂和城里大部分地方都成了废墟。我们住在被毁房屋的地下室里。我们的大炮设在离城大约五英里的地方，朝着 Passchendale Ridge 的方向，我们的部队正在想办法从德军手里夺下那道山岭。每隔一天早上，我们就要走到炮兵阵地去值24小时的班；我们经过的地方原来都是村庄，现在连一块砖都不剩。离开大路，到处都是烂泥，深的到膝盖，深的到大腿。这烂泥也有它的好处，因为它能把炸开的炮弹碎片闷住。

那时候我和一个典型的老兵搭档，他总是对什么事都抱怨发牢骚。不过，我们俩好像处得还不错。有一天，我们被派去检查安装在一个旧德军炮位里的电话线路。门口对着德军防线，门是一条浸满了泥的湿毯子。你曾为一条湿毯子感谢过神吗？我刚走进去，正想让眼睛适应里面的烛光，一颗德军炮弹就在门外炸开了。毯子把弹片都闷住了，可是蜡烛全都灭了。我吓得不轻，里面的人还骂我把那颗炮弹招了来。紧跟在我后面的 Brown 怎么样了？我喊他。他喊回来："我被打中了！"我冲出去——他被炸飞了20英尺，落到了炮位的另一边。他正在自己身上摸来摸去，想找出哪里被打中了。其实他根本没被打中，只是被震得厉害，那天我们的任务也就到此为止了。

加拿大步兵拿下了那道山岭，伤亡惨重。圣诞节期间，我们被撤下来休整。加拿大军队的司令 General Currie 到我们休整的农场来看我们。战前他在 Victoria 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我常常送包裹到他家。他在讲话中说，拿下这道山岭，就为我们春季攻势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到了1918年春天，德军发动了攻势，把我们的部队赶下山岭，几乎一直退到 Ypres。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那时候我们驻扎在 Vimy Ridge 的南端。我们得不到消息，但从观测气球的位置可以看出，德军正从我们的北边和南边推进。我们处在一个很危险的突出部里。我们的军官都很紧张，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很难撤退。暗号是“Ottawa”。意思就是把大炮炸掉，各自想办法逃命。幸好我们不必逃跑。美国援军到达西线以后，德军的攻势被挡住，局势也扭转了。

那年夏天和秋天，我们脱离了战壕战，因为德军正被一路击退，我们也更经常地在移动。我们刚刚进入阵地，命令就又来了，要我们再转移。我们所经过的地区，破坏没有那么严重。我们在一些村子里停留，那里的居民才刚刚撤离不久。这里的危险是敌人留下的诡雷。有个士兵走进一户人家，那里有一架钢琴；他一按琴键，钢琴就爆炸了。在那次推进中，我们碰上了一些毒气，不过已经散得差不多了。除了流眼泪、流鼻涕，好像没怎么影响我们。我不想被人当成装病逃避的人，就懒得去报告。后来我才明白，要是我的记录里有一次看病的记载，对我会很有帮助。退伍以后，我也为此尝到了一些后果。

有一天傍晚，我们的一个战友碰巧扔石头打死了一只兔子。我们从一个法国人的菜园里摘了些蔬菜，炖了一锅香喷喷的兔肉，换换口味，不用再吃咸牛肉罐头和硬饼干，真是太好了。接着到了十一月，传来了停战的好消息。我至今还保存着一张发给我们炮兵连的电报单：“敌对行动将于11月11日11时停止……不得与敌人有任何形式的往来。”在比利时的一个村子里，在第十一个月第十一天的第十一个钟头，我们互相拥抱，欢喜快乐，战斗总算结束了。有时候真觉得它好像永远打不完！我们搬进了 Mons 附近的一个小镇，在那里住了几个月。英军的“Ol′ Contemptibles”（老兵们的自称）就是在这里第一次和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德军交手的，那是在1914年。

德军撤出 Brussels 才十天，我们几个人就拿到通行证去那里参观。我们在主广场上的一家酒店里奢侈了一把，吃了一顿很贵的饭。去的路上我们经过 Waterloo，那里让人想起更早的一场战争。军队开设了一些实用的课程，帮助大家回到平民生活。1919年初，我拿着通行证去英国看望我的哥哥。回来的时候我经过 Folkestone，要在那里坐船渡过英吉利海峡。有些加拿大人正在示威，要求马上回加拿大。这一耽搁，倒让我有机会去看望住在那里的舅舅和舅妈。到了法国，我又在一个基地营被耽搁了，不过最后总算上了一列火车，坐在一节货车车厢里。那列火车是开往德国 Cologne 的，我很想一路坐过去。可是，因为我已经算是擅自离队了，我决定在 Mons 附近跳下车。我怕要是离开太久，可能会耽误我回加拿大。

春天，我们转到 North Wales 的一个营地，等候启程回加拿大。五月初，我们在 Southampton 登上了 S.S. Mauritania 号。名字以“B”开头还真占了便宜——我被分到一个船舱，而不是在货舱里睡吊床。Mauritania 号是那艘命运悲惨的 Lusitania 号的姊妹船，Lusitania 号在战争初期被德军击沉了。多年来，Mauritania 号都是横渡大西洋最快的船。我们这一趟也不例外。我们主日晚上离开 Southampton，星期五一大早就到了 Halifax。下船一切顺利。去西海岸的人最先下船，上了一列等在那里的火车。那天早上有好几千人下了船，到了中午，船就开往 New York 返航去了。

在这3000英里旅途中的许多城镇，都有欢迎的人群迎接归来的老兵。只有在旅途的最后一段，当局把事情搞砸了。我们不得不再体验一回军队那种“赶紧来，然后干等着”。从 Vancouver 到 Victoria，他们包了一条慢船，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坐平常每天开的那班船。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Victoria 的内港是世界上风景最美的港口之一。那年五月的那个傍晚，我们挤满了船的前半部分，内港看起来从来没有那么美过。船靠近码头的时候，正前方就是美丽的 Empress Hotel，爬满了常春藤，四周都是草坪。右边是庄严的政府大楼，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花坛十分漂亮。可是最好看的景象，是那些在码头上等候的亲人，我们一出现在他们眼前，他们就拼命地挥手。平平安安地回家了！“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我能从可怕的战争中回来，真的只是因为那格外丰盛的恩典。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第 5 章

蒙召去宣教工场

“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戒你。”（Psa. 32:8）

在回家之前的那几个月里，我认真面对了一个问题：我的生活方式需要改变。离开军队、告别军旅生活，似乎正是和主把关系摆正的好时候。不管怎样，我已经厌倦了以前那样的生活，厌倦了那样轻慢地对待主，尽管祂有那么奇妙的恩典，在多年的战斗中保守我平安。停战以后，我戒了香烟，改抽烟斗。就算在那时，远在人们警告肺癌之前很久，香烟就已经被叫做“棺材钉”了。横渡大西洋的时候，我把烟斗和烟草都扔进了大海。我把生活清理干净了，可是还没有开始好好读神的话语。

我到家后不久，Fisher 弟兄邀请我去 Deep Bay 和他住一段时间。他的一位兄弟是去今天的赞比亚那一带的开拓宣教士之一。Fisher 先生在海边有几英亩地，种些芦笋和黑醋栗，好补贴他的退休金。在园子里干活、去钓鱼，让我从战争的经历中好好歇了歇。他送了我一本 Scofield 圣经，我开始养成每天读经的习惯，这本圣经对我很有帮助。

还有，在我回来后不久，有人宣布 C.A. Swan 要在 Victoria 市中心的 Victoria Hall 讲三场聚会。他是中非的开拓者之一，有许多扣人心弦的故事可讲。他1887年第一次去非洲。1904年，他因为健康的缘故去了葡萄牙，战争期间在法国和葡萄牙军队一起工作。这让我很感兴趣，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们在法国的炮兵连里也有一些葡萄牙人随队。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听宣教士讲话，特别是从非洲回来的宣教士；可是这一次我去，多半是出于好奇，根本没想到那几场聚会会对我自己的一生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第三场聚会时我坐在哪里。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Swan 先生讲道之前先祷告。他为那些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人祷告——为那些丈夫再也回不来的妇女祷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6万多加拿大人阵亡。然后他为那些正在归来的人感谢神，并且说："主啊，让他们知道你保全他们是为了什么！"他还为别的什么祷告、祷告了多久，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在我身上，他的这个祈求立刻就得到了应允。主对我说话了。那不是耳朵听得见的声音；别人谁也没听见。可是对我来说，它就像讲道人的声音一样真实。"我保全你，是要你去宣教工场！"我很愚蠢地想跟主争辩——那总是白费力气。"可是主啊，我离家三年，才刚刚回来。我不想马上又离开。我有一位守寡的母亲，我得留在这里，盖一座房子，供养她。"我又听到祂的声音："你为了国王和国家离开了家，难道你不愿意为了我离开家吗？难道你不相信我能照顾你的母亲吗？"跟那位知道一切答案的主争辩，又有什么用呢？Swan 先生还没有结束他的祷告，我也已经祷告了："好吧，主啊，如果这是你要的，我愿意。"

神是千变万化、无穷无尽的神，祂用不同的方法呼召祂的仆人。祂这样直接说话的时候并不多，但我为那次清清楚楚的呼召感谢祂。在我们第一次休假回国的时候，我在 Victoria 又见到了 Swan 弟兄，告诉他那天晚上神怎样立刻应允了他的祷告。

去宣教工场之前，首先要做的事之一，就是为我的母亲和妹妹 Florrie 盖一座房子。我们买下了两块地，呈 L 形围着我姐姐 Ethel 的家。我做过的工作之一，是给一位当建筑商的弟兄干活。我利用空闲时间，把我们买的那块地上的一座小房子拆掉了。在我们那位建筑商朋友的帮助下，图纸画好了，房子也开工了。1919年夏天，工程进展得很顺利。很多个晚上，聚会里的年轻小伙子们都会来帮忙盖房子。

我在与主同行、以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祂的话语为粮食中，又在领会祂呼召我作宣教士的恩典中，找到了一种新的喜乐。我常常一边干活一边唱歌。有一天，我在屋顶上铺木瓦，一边唱着歌，忽然发觉自己刚刚唱的是："有一天这地上的房屋要倒塌。"我一下子觉得太好笑了。据我所知，那座地上的房屋过了六十多年还立在那里。母亲去世以后，Ethel 和 Richard 卖了他们的房子，搬进了那座房子；Ethel 被主接去以后，那座房子才卖掉了。

加拿大政府为退伍军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特别是那些像我一样十几岁就参军的人。我申请去 Bible Institute of Los Angeles，可是被拒绝了，因为它不在加拿大。那时我不知道加拿大有什么圣经学校，其实 Vancouver 就有一所。所以我申请了 Victoria 一所商业学院的商科课程。

整个秋天和初冬，我都在拼命忙：白天上课，晚上盖房子，除非那天晚上有聚会。Harris Gregg 博士开了一系列的圣经讲座，我中午和晚上都去听。这些讲座在我的属灵生命上是很大的祝福，可是这样的节奏开始让我吃不消了。

1920年1月初，天气特别冷。有一天早上我正在穿衣服，看见镜子里映出火光。我冲出去，看见一位邻居的房子着火了，就赶紧跑过去，看能不能帮上忙。房主正从地下室出来，说房子里没有人。我正要去看看能不能抢救出他的一些东西，屋顶就塌了下来，再也没有办法了。

那以后不久，我得了支气管炎，后来发展成了肺炎和胸膜炎。我住进 Jubilee Hospital 的时候，还没意识到病情有多严重。我只想着每吸一口气，肋骨那里就像刀扎一样疼。那天夜里大约十一点，退伍军人的随军牧师进来为我祷告。我纳闷他为什么这么晚来。我很感激他的关心，虽然我想他并不是一个得救的人。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那天晚上，有一位从印度来的商人，原定在 Oaklands Chapel 带查经。就在他讲之前，有人宣布我病重住院，医生认为我活不过当天夜里。这件事我后来才知道。那位客座讲员建议大家不要查经了，改为专心祷告。“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神。”（Acts 12:5）。“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Jas. 5:15）。这并不是说一定要马上痊愈——在我身上，那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医生想用针头抽出胸膜腔里的积液。可是没有成功，因为积液已经化成了脓。那就需要做手术，在肋骨之间切开，插进一根引流管。母亲在我进手术室之前来看我，说：“万一有什么事，也没关系，对吧？”我回答：“当然没关系，可是不会有什么事的。我要去宣教工场，这一定是训练的一部分。”给我开刀的是 Wace 医生，他是加拿大最好的外科医生之一，可是我的信心不在他身上，而在主身上。

我从乙醚麻醉中醒过来（那味道真难闻！），病房的护士长 Harman 小姐笑眯眯地跟我打招呼。她是一位热心的基督徒，后来去了刚果作宣教士，在那里的叛乱中殉道了。医院的总护士长却完全是另一种人。护士们一听见她在医院走廊里气冲冲地走过来，就吓得要命。母亲给我带来了几朵紫罗兰，那是园子里仅有的花。花太小了，找不到合适的花瓶，护士就把它们放在一个小碟子里。McKenzie 小姐走进房间，一眼看见那些紫罗兰，气呼呼地一把就把我的紫罗兰拿走了，嘴里说：“紫罗兰放在我的盐碟里！”虽然我身体很虚弱，还是忍不住笑了，可那位护士一点也不觉得好笑。

和我同房的是从 Ladysmith 来的 Enoch 先生。他不像圣经里和他同名的那个人，因为他不是信徒。我和来看我的人有许多机会向他作见证，讲救主的事。他好像已经快要作决定了，可是有一天他说：“我没有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你那样的信心。”我回答说：“你以为信心是什么，像商品一样有57个品种吗？”要紧的不是你的信心是哪一种，也不是你的信心有多少——关键是我们信心的对象。他出院的时候，还没有把信心放在基督身上。

两三个月以后，又积了脓，所以又安排了一次手术。这次是 Russell Robertson 医生做的，他也是一位很出色的外科医生。他个子很高，举止庄重，有一双锐利的眼睛。他会站在病人的床尾，看看病历，再看看病人。有些病人说，他根本不需要 X 光，因为他一眼就能把你看透。负责我病情的是 Baillie 医生，我和他相处得很融洽。

那年夏天，我被转到 Esquimalt 的军医院，从那里可以俯瞰港口。那里的环境好多了，可是来看我的人要走很远的路。那里的总护士长很不一样。她纪律严明，可从来不提高嗓门，也从不当着病人的面纠正护士。她是一位凭着公正赢得大家尊敬的女士。

在那里发现我的肾脏也受了影响，得了肾炎。这就意味着要洗坐浴，还要限制饮食。那时正是草莓季节，每顿饭都有一盘草莓，我可一点也不反对。医生开了每天一瓶 Guinness 黑啤酒当补药。因为这是当药开的，我在良心上并不反对，可我就是不喜欢那东西。其他病人都想要同样的处方！

那里有一个护工，又矮又壮，胳膊很长。大家都叫他 Tarzan。他弄坏过不止一张不好调节的床头桌。那时候的护士是一个个子特别高大的姑娘，差不多有六英尺高，身材匀称。有一天晚上，Tarzan 把晚饭托盘端了进来，却没有甜点，甜点是炖杏子。护士叫他把托盘端出去，到病房的厨房里把甜点加上。在 Tarzan 看来，更简单的办法是把那一大碗杏子端进来，用勺子舀到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托盘上。这就成了一场意志的较量。她命令他把托盘端出去。他威胁说要把杏子扔到她身上。她有权柄，可他有力气！他把那一整碗杏子扔了过去，正中目标。她从帽子到整个护士服上都是杏子。她哭着跑出去换衣服。Tarzan 在病人们愤怒的喊声中匆匆走掉了。他再也没有回来！

十月，总护士长好心安排了一辆救护车，送我回家和家人过一天。这份好意我非常感激。到了十一月底，我出院了——那一年差不多全是在医院里过的。我申请新课程的事被拒绝了，因为委员会说我的病和服役无关。要是我在法国吸了那一口毒气的时候去看了病就好了！

那么多个月没来，回来后的第一个主日，第一次再领主的晚餐，真是一个宝贵的时刻。有人报了一首诗歌“Awake, my soul, in joyful lays”（我的心哪，要欢然歌唱）。我请大家把其中一节再唱一遍：

“当患难像阴沉的乌云，
密密聚集，雷声隆隆，
祂总是站在我灵魂身旁，
祂的慈爱，啊，何等美好！”

我出院几个月以后，有人给了我一份工作，让我有一个极好的养病机会。我们的朋友 McGee 夫妇负责管理 D’Arcy Island 上一个小小的麻风病人收容所，那个岛离 Victoria 只有几英里。McGee 太太要去英国几个月，她丈夫需要有人作伴、帮忙。那真像是度假一样，因为活儿很少。除了五个麻风病人，全都是华人，就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住在 Big D’Arcy，半个小时就能绕岛走一圈。附近是 Little D’Arcy，岛上没有人住。那里有一个小海湾，是私酒贩子藏身的理想地方。那时正是美国的禁酒时期，我们离边境只有几英里。因为我们既没有通讯工具，也没有任何保护，所以聪明的做法是对周围发生的事不闻不问。我有时间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思考将来，并为作宣教士的事祷告。有一天，主非常清楚地让我明白，无论祂差我到哪里去，我都必须学会爱那里的人，即使他们在某些方面似乎不那么可爱。那时我还不知道祂要我去哪里。我有些想去非洲，也想过去葡萄牙帮助 Swan 弟兄。

在那些等候主开门的年日里，Duncan McKerracher 弟兄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教一班年轻小伙子，我们从他对圣经的认识中得了很多益处。有时候祷告会结束后，我们会拿着圣经站在路灯底下，寻找我们问题的答案。他向我介绍了一些好书和对人有帮助的作者，像 Sir Robert Anderson、A. T. Pierson 博士等等。

有一天晚上，我们去拜访了 Cecil Hoyle 先生，他那时已经是位老人了，从1876年到1907年在西班牙作宣教士。

有时候我会想到 Oaklands 的长老们。他们当中有些人才三十多岁，只比我大十岁左右。再过十年，我能有讲道、教导和带领一个聚会的能力吗？这又是一个挑战，要我更殷勤地专心研读神的话语。

有一位年长的弟兄叫 Billy James，是个单身汉，有点古怪。可是他真心爱主，满有主的喜乐。他是个扫烟囱的，脸上的煤灰好像从来都洗不干净。可是在敬拜聚会中，他那张脏兮兮的脸会因着他对基督单纯的爱而容光焕发。母亲常常请他主日到家里吃午饭，尽管她心里觉得他真该好好洗个澡！

每个星期六晚上，在 Government Street 一个叫“Stranger's Rest”（客旅安歇处）的福音站外面，都有露天布道会。Billy 会下了工直接过来，满脸都是煤灰，对着所有听得见的人宣告：“我的脸是黑的，可我的心是白的，因为被羔羊的血洗净了。”有一天他对我说：“你注意到街对面那家糖果店的希腊老板了吗？他整个晚上都坐在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楼上的窗户边听。我们来为他的得救祷告吧。”在我们第一次休假回国的时候，我们到 California 的 Long Beach 一户人家做客。女主人请了一位基督徒女士帮她洗衣服。这位女士熨衣服的时候，我得知她是从 Victoria 来的。原来她的丈夫 Phillips 先生，就是那家糖果店的希腊老板。他已经得救了，放下了他的生意，在美国的希腊人中间全职事奉。

Billy James 常常在 Stranger’s Rest 吃一顿简单的午饭。他邀请我去和他一起吃，再一起祷告一段时间，我很乐意去。我听说以前 John Lamb 也曾和他一起祷告，后来去了委内瑞拉，从1920年到1932年在那里事奉主。接着是 Dan Baillie。Dan 是从岛上北边的 Ladysmith 来的，但当时住在 Victoria。他在满洲作了五年宣教士（1921–1926年）。我有幸接着他们，和这位亲爱的弟兄一起在福音站的一个角落里跪下祷告。他自己从来没有去过海外宣教工场，却用祷告帮助别人走上了宣教的路。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第 6 章

为宣教工场作准备

“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啊，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Psa. 138:8）

1921年头几个月，Tom Baird 先生来到 Victoria。他以前在马来亚作过宣教士（1893–1906年），是一位很有感染力的讲员，特别喜欢用押头韵的句子。他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凭记忆引用）：

> *“哦！愿我的意志甘心要神的旨意，那样甘心就必蒙福。*
> *那甘心要神旨意的意志，必住在神的旨意之中。”*

通过他，我知道了在 New York 的 Brooklyn 有一所 Missionary Training School（宣教士培训学校），由 Richard Hill 夫妇主持。（Baird 夫妇的女儿嫁给了 Rowland Hill，他是 Richard 的兄弟。）Richard Hill 夫妇从1908年到1918年在波斯和突厥斯坦作宣教士，他们开办这所学校，是为了帮助那些准备去宣教的人。

我那时真是太天真了，竟然祷告求 Oaklands Chapel 的长老们全体一致愿意推荐我去作宣教工作，而且首先是去 Missionary Training School 学习一段时间。现在我对长老们的作风懂得多了，就没有信心再作这样的祷告了。可是他们非常恩慈，确实推荐了我；就算有人反对，也没有人告诉我。那些日子里，Duncan McKerracher 的劝勉对我是很大的帮助和祝福。到了八月，我终于收到了 Hill 先生的回信，欢迎我到学校去。收到他的信以后，我读了 Psalm 138，大得祝福，确信主必在我身上成就祂的旨意。不过，我对将来在哪里事奉还没有得到引导，虽然我的心思转向了非洲，或者也可能是葡萄牙，因为我知道 Swan 先生在那里需要帮手。

从 Victoria 去 New York 的路上，我在 Ontario 的 Port Hope 停留了一天，去看望我的 Millie 姨妈和两个表亲。她是我母亲最小的妹妹，嫁给了一个退伍的军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人。他自称是基督徒，常去一间浸信会教会。那里的会友大概不知道他对家人有多么刻薄。在我去之前不久，他在铁路上干活，出了事故。对我姨妈来说，能免受他的刻薄，真是松了一口气。

从 Montreal 坐火车快到 New York 的时候，我正在刮胡子。在洗手间的镜子里，我看见一位乘客打开他的箱子，最上面放着一本圣经。我以为他是基督徒，心里正想着怎样跟他搭上话。他显然是一个推销员，和洗手间里另一位乘客认识。那人说："那是什么——圣经？我还不知道你信那一套呢！"那人回答："我不信，可是带着它过海关方便些！"

一个陌生人在纽约的 Grand Central 下车，想找到去 Brooklyn 的路，那可真是一番经历。我刚拿起手提箱，就有个人过来说要帮忙，我谢绝了，因为我怀疑他别有用心。我找到一列标着"Brooklyn"的地铁，可是下车下早了，还在 Manhattan 市中心。上到地面，在 City Hall 前的广场上，我问一个人怎么去 Brooklyn 的 Seventh Avenue。他回答说："看见那栋高楼了吗？那是 Woolworth Towers，世界上最高的楼（那时候是）。"我可没兴趣听导游讲解，我只想去 Brooklyn。他接着说："到那边去，在那栋楼底下，你会找到去 Brooklyn Flatbush 的地铁。Seventh Avenue 就是从 Flatbush 岔出去的。"

所以中午以前我就找到了学校，可是那里只有一家回国休假的宣教士，Asa Moore 夫妇。Moore 太太是 Richard Hill 的姐妹。他们把午饭分给我吃，告诉我大家都到 Long Island 的 Sea Cliff 参加特会去了。于是到了下午三四点钟，我已经找到了 Sea Cliff 的特会。当时正在开会，是一场问答聚会，台上有 C.F. Hogg 和 Harold St. John。有一个提问的人想知道，为什么各地聚会的信徒在那里可以彼此交通，可是他们回到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家里，有些聚会之间却一点交通都没有。Hogg 先生举起双手回答说："这就是弟兄们的前后不一啊！"另一个问题是那个老生常谈的"为死人受洗"。Hogg 先生和 St. John 先生都说，他们见过很多种解释，没有一种让他们满意。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聚会结束后，我走近一群人，他们正围着一位弟兄，那位弟兄好像认为自己知道答案！

晚上的聚会结束后，我在礼拜堂楼上找到一张行军床，这礼拜堂就是 Sea Cliff 聚会平常聚会的地方。住在那里的年轻人相当吵闹。好像也没有人管。我经过漫长又兴奋、满是新鲜景象的一天，已经很累了。过了十一点，我想，这样在邻居面前对聚会是很不好的见证。于是我走到楼梯口，在一片吵闹声中要他们安静下来。第二天早上，我注意到有人偷偷往我这边瞄。当然，他们谁也认不出这个陌生人是谁——我也没告诉他们。

因为我会做木工，身边也带了些工具，特会结束后，有人请我帮忙修理 Sea Cliff Yacht Club。这栋楼面向 Long Island Sound 的海岸，已经由特会委员会买下来了。星期六下午干完活，我和 George Fraser 一起到码头去游泳，他当时正准备去委内瑞拉。他戴着眼镜跳下水，结果眼镜掉了。他潜下去好几次都没找到，这让他很不方便。第二天一大早，他为这件需要祷告之后，趁着退潮到海边去。尽管海水在满是卵石的海滩上翻来翻去，他竟然在那里找到了他的眼镜，完好无损，连一道刮痕都没有。

我们在 Brooklyn 安顿下来的时候，学校的楼房也有些活要做。男生住在顶楼，我和从 Kansas City 来的 Leonard Bewick 同住一间。从 Ottawa 来的 Horace Davey 和从 Buffalo 来的 Tom Mornan 住另一间。顶楼还住着我们班上唯一的一对夫妻，从 New Jersey 的 Paterson 来的 William 和 Margaret McKellin。在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下面一层住的是女生：从 Peterborough 来的 Carrie Saunders，她后来嫁给了 Horace；Margaret (Peg) Fleming，后来嫁给了 Guatemala 的 Kramer 先生；Seattle 的 Margaret (Meg) Dryden，后来嫁给了 James Buckley；还有 Len 的未婚妻 Irene Stedman，和从 Buffalo 来的 Anna Carson，她们俩同住一间。

九月开课后不久，Long Island 的 Richmond Hill 聚会有一个星期六的特会。好几个学生本来打算去，可是一个接一个都不去了，最后只有 Anna Carson 和我去了。聚会中，Brooklyn 的一位长老 Scott Aspinall 坐在我们前面隔几排的地方。他的头一直在点，可不是在赞同那位讲个没完的讲道人！我轻轻碰了碰 Anna 的胳膊肘，让她看看他拼命想保持清醒却白费力气的样子。那一碰可没有什么爱慕的意思。其实那时我以为她在 Buffalo 有男朋友。回到学校，我碰巧跟男生们提起这件事，倒是他们后来的取笑，真的引起了我的兴趣。后来他们讲了一个笑话：有一个黑人要买雪茄，可是不知道该买哪个牌子。他也拿不定主意该娶哪个女孩。店员建议说“Havana”，那位顾客马上高兴地回答：“就这么办——I'll have Anna（我就要 Anna）。”（英文“Havana”听起来像“have Anna”。）不过，我可不是在寻求那种引导！但在讲主怎样引导我之前，让我先岔开一下，讲讲 Anna Carson 的家庭背景。

1890年代初，一个年轻的木匠 Samuel Carson 离开北爱尔兰 Ulster 的 Ballymena，前往纽约州的 Buffalo。他发现那里只有一个聚会，很失望，因为他熟悉的 Belfast 有很多聚会。在 Buffalo，他认识了一个爱尔兰姑娘 Rose Logan，她来自离 Ballymena 大约二十英里的一个村子。他们结了婚，在美国生了两个孩子，然后回到 Belfast。事实上，他们不止一次漂洋过海。他们的九个孩子当中，最大的两个和最小的两个都是在 Buffalo 出生的，其余的都生在 Belfast。九个孩子中排行正中间的就是 Anna，她上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下面也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Anna 四五岁的时候，他们离开 Belfast 回到 Buffalo，Carson 妈妈就再也不肯漂洋过海了。

Anna 有点像个假小子，只要有机会和男孩子们打棒球，她马上就会丢下洋娃娃。有一位来访的朋友问她走路上学要多久。她不知道，因为她从来不是走路去上学的。“我要是翻过后院的篱笆，穿过那几块空地，三分钟就到了。”

Anna 在基督徒家庭长大，又经常上主日学，她知道得救的道路。她的主日学老师是 Jeannie Mowat，有一个星期天，她问女孩们有没有得救。Anna 回答说：“有——我想是吧。”后来，Jean 的丈夫 Gavin Mowat 在星期天晚上的聚会中讲道。回家的路上，他问 Anna：“Anna，你得救了吗？”这一次她能很有把握地回答：“是的，我现在知道我得救了。”她以前就信了，只是缺少得救的确据。

就这样，Anna 在 Buffalo 读完了小学和中学。她和 Gavin 及 Jeannie Mowat 的友谊，激发了她对宣教的兴趣。Jean 的兄弟 George Gibson 娶了 Anna 的大姐 Sarah。Mowat 夫妇去了中非（1911-1927），后来又去了南非（1928-1950）。只要在 Buffalo 的 Assembly Hall 聚会久一点，没有人会不关心宣教的。Edward Fairbairn 是一位带头的弟兄，虽然他是 Buffalo 的商人，却对宣教充满了热情和活力。

Anna 说她想做宣教士的时候，Carson 妈妈怎么也舍不得和女儿分开。她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基督徒，可是觉得很难面对这样的牺牲。那段时间，Anna 在主日学教一班小男孩，其中有 Lyndon 和 Laurence Hess，还有 William Oglesby，他们后来都去事奉主了。Anna 不肯违背母亲的心意，她深信，如果主要她做宣教士，祂会感动她的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母亲，让母亲同意她去。耽搁的这一两年是一段考验的时间，也是神预备的一部分。终于在1921年，母亲同意了，Anna 就去了 Brooklyn。她后来常说，如果当初照着她自己的意思早一点去，我们很可能就不会相遇了。

随着我对 Anna 的关心渐渐加深成了爱，我意识到，在终身伴侣这件事上，必须非常确定主的旨意。我刚到学校的时候，有人给了我一份讲“The Will of God”（神的旨意）的单张。这份单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真理：神对每一个信徒的生命都有计划和旨意。我决心好好研究新约对神旨意的教导。我借着经文汇编，把每一处有关的经文都查了出来。这可不容易，因为英文的“will”这个词常常是当助动词用的。我学到最重要的功课之一，是关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在四福音书里，祂只有大约三次提到祂自己的旨意，而每一次都是为了别人的福气。

于是我开始恳切祷告，求主让我知道祂对 Anna Carson 的旨意。自然，我越为她祷告、越想她，就越渴望得到她。可是主没有给我绿灯，我也没有确据这就是祂对我的旨意。几个星期过去了——那是灵里挣扎的日子。有一次，我决定试一个我明知不对的办法。我要让圣经自己翻开，看看翻到哪节经文。自然，圣经在中间附近翻开了，正好是约伯记。映入眼帘的是这几句话：“我和自己的眼睛立了约，怎么还能想着一个姑娘呢？”(Job 31:1)。这可不是我想要的！我再往下读，就更泄气了：“我的心若被女人迷惑”(v.9)。不过，我为这件事祷告的时候，心里就知罪了，知道这样对待神的话是错的。后来我得到的引导，不是关于终身伴侣，而是怎样把圣经应用在我当时的处境上。

我就这样省察内心、寻求主的旨意，又过了好几个星期。后来有一天早上，我们在班上学习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基督的生平，大纲最下面有一句话："他们就撇下一切，跟从了耶稣"(Luke 5:11)。这句话激励了我！四个渔夫刚刚打到了他们一辈子最大的一网鱼——在市场上能卖多少钱啊！可是他们撇下了一切：鱼、朋友、财富、家人，去跟从祂。这时我才意识到，我虽然恳切想知道祂的旨意，却并没有撇下一切。在我内心深处有一个没说出口的愿望："主啊，我要你的旨意，可是求你让它正好是我想要的。"我没有完全顺服，我没有撇下一切。班上以祷告结束的时候，我也作了我自己的祷告："主啊，如果你要我一个人去宣教工场，我愿意遵行你的旨意。"

这不是一个容易学的功课。必须完全降服于祂的旨意，心里一点保留都没有。"人若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就必知道……"(John 7:17)。我们必须先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然后才能知道祂的旨意是什么。（要知道神的旨意，我们必须准备好去做和自己所渴望的正好相反的事。）然后我才知道，我们的神是何等奇妙、何等有恩典！好像就在我到了完全降服的那一点（而且是真心的）之后，主几乎立刻就把我所渴望的赐给了我。我心里有了确据：主的旨意是要我请 Anna 和我共度一生。

为了在邻居面前顾及体面，学校不许男女学生成双成对地出去。后来我们见面的时候，也并没有违反这条规矩。于是在1921年12月3日，Anna 和我各自出门，在约好的地方会合。那时我第一次告诉她我爱她，才发现她也爱我。六十年后，我们还在彼此说着爱！我们穿过 Prospect Park（现在去恐怕就不安全了），我在那里告诉她主一路怎样带领我，又告诉她，在我的生命中，除了主以外，我希望她占第一位。Annie Hill 小姐托 Anna 帮她买些 argyrel（一种消毒药水），可是我们一兴奋，竟然开口要了砒霜！药店店员脸上的表情让我们意识到自己说错了。Hill 小姐始终不知道，我们的恋爱差点害了她！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我们班上很多事情都一起做，彼此有很好的交通。我们常常一起去参加特会、去为别的宣教士送行，还有每周去听 Baldwin 医生的医学课。大部分下午都在一家医院的门诊部帮忙。上午专门用来上圣经课。John Hill 是大多数人最喜欢的老师。他以前是商人，头脑很有条理，他的大纲对我们的学习很有帮助。他很关心学生，安排我们去参观博物馆或 42nd Street Library 这些地方，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一些珍贵的圣经古卷。Richard Hill 和他的兄弟不一样，他更像是一位灵修性的讲员。大家都很敬重 George Aldrich，因为他丰富的属灵教导有敬虔的生活作后盾。他读 I Corinthians 15 的一部分，令人难忘——那是在 Faulkner 先生的葬礼上，Faulkner 先生是 Richard Hill 太太的父亲。Aldrich 弟兄以前是圣公会的牧师，他的吐字非常优美。

有一位 Wall Street 的商人 Charles Bellinger，每周有一个晚上来教加拉太书。他提的问题逼着我们自己去思考。即使我们的答案是对的，他有时也会反驳，看我们能不能坚持立场。有些学生就算没被吓坏，也被镇住了！不过他是学生们真正的朋友，对宣教也非常热心。别的讲道人和宣教士来访，我们也得益不少。我们不会很快忘记从 Guatemala 来的 Charles Kramer 那次来访。他英语说得不多，却会用西班牙语放声高唱，直到有一天警察来告诉我们，邻居在抱怨了。

学校生活也不是没有轻松的一面。有些人很怀疑我们是不是适合将来做宣教士。可是我很同情没有幽默感的宣教士。厨师 Harriet 是纽约一个黑人聚会的姊妹。她的房间就在我们顶楼浴室的正下方。有一天晚上，Anna 和我进门时，发现她房间里在滴水。Harriet 那个周末不在。我跑上楼，看到浴缸的水溢出来了，就把水关了。在 Tom 的房间里，大家照常在讨论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拣选或预定论的问题。我随口问了一句，是谁打算洗澡啊。Tom 吓得举起双手——他完全忘了自己还开着水龙头。那之后不久，我们重新粉刷楼上的房间。Len Bewick 负责浴室。因为浴缸后面很难进去，他就把浴缸一头稍微挪了挪，结果把排水管弄断了。Harriet 的房间又一次下了一场不请自来的"雨"。

从某些方面来说，学校的条件并不理想。他们让我们明白，我们"只是学生"，我们也学会了做卑微的工作。不过，我们所受的教导还是有益处的，和许多人、许多聚会的接触也很有益，特别是在 New Jersey 一带。

另一个好处是，我们认识了那一带聚会中许多属主的人，特别是在 New Jersey 那边。我们有幸认识了一些带头的属神的人，我们至今仍珍惜对他们的回忆，他们大多数现在已经回天家与主同在了。

通常我们男生会两个两个结伴，在主日去访问某个聚会，很多时候是应邀去的。我们彼此约好，去的时候一个人付两个人的车费，回来的时候另一个人付。有一个星期天，Len Bewick 和我出发去 New Jersey。因为我手头紧，就让他付去程的车费。我仅有的一点钱都放进奉献里了。在这种场合，常常会有人悄悄把一些钱塞到我们手里。可是那天我什么也没收到，我也怀疑 Len 的钱够不够付我们回程的车费。我暗暗为这件事祷告——连 Len 都不知道我的难处。一位弟兄开车送我们到火车站，可是没有钱，我们怎么买票呢？就在我们下车、我和那位弟兄握手道别的时候，我觉得手里留下了一张钞票——付我们的车费还绰绰有余。那些日子，我们学到了许多信心的功课，也学到了信靠神是什么意思。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第 7 章

关于宣教工场的引导

“主啊，求你让我认识你的道路，把你的路教给我。”(Psa. 25:4)

在学校的那一年，我们常常祷告，求主引导我们知道祂为我们计划的事奉范围。Anna 心里想的是南美洲，而我想的是非洲或葡萄牙。十二月的一天早上，全体学生照着每天的习惯一起祷告。好像主对我说：“到菲律宾去！”我连菲律宾在哪里都不知道，只猜它大概像夏威夷一样，在太平洋的某个地方。照我记得，我以前只听人提过一次这些岛屿。就在那之前不久，Oaklands Chapel 的一位长老 John Thomson 写信给我，讲到 George Wightman 夫妇去那里访问的事。他们以前在墨西哥事奉主，那时正在去菲律宾的路上。几天以后，我顺路走进 Brooklyn 的一家旧书店，发现了一本讲菲律宾的书。平常我常泡在这种书店里找圣经方面的书，可是那一次我在找别的东西。

那年圣诞节，一位从 Victoria 来的老朋友请我去他那里玩，他在新英格兰务农。那年冬天很暖和，所以我真的很享受这个离开城市、离开功课的机会。农场上我帮不上什么忙，就去走很远的路。有一天下午，我走到一片沙滩，在海边走来走去。我祷告，如果菲律宾是主为我们拣选的地方，求主再一次把菲律宾摆在我面前。那天晚上，Joe 和我坐在噼啪作响的炉火前聊天。他提到在委内瑞拉的 John Lamb，说那里讲西班牙语。然后他说，他有一个邻居会讲西班牙语，是当兵时在菲律宾学会的。Joe 完全不知道我心里为那个国家所挂虑的事。不过他提得那么随意，所以我求主再给我进一步的印证。

回到 Brooklyn 后，我参加了在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学校举行的除夕守夜聚会。第二天早上，我到 13th Avenue Gospel Hall 去参加主的晚餐。桌上放着几本新出的“Voices from the Vineyard”。我翻看这本宣教杂志，注意到有一封 George Wightman 的信。可是吸引我目光的，是那封信正上方用粗体字印的编者按。上面说，菲律宾群岛在美国管辖之下已经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位由美国的聚会推荐差派的宣教士在那里事奉主（Wightman 夫妇是从苏格兰来的）。这就是我求引导的祷告的答案。进一步的印证是，同一期还讲到 A. G. Ingleby 要去葡萄牙帮助 Swan 先生。好像主在告诉我，祂已经为葡萄牙另外拣选了人。

我第一次回国休假的时候，把这件事讲给 Voices 的编辑 Richard Maclachlan 听。他记得那条编者按，说他想不起来自己还有哪一次这样做过。

我心里毫不怀疑我们应该去菲律宾，可是 Anna 想要她自己对主的旨意有确据。她不满意我的理由——如果主的旨意是要我们结婚，那祂就不会把我们差到不同的工场去。说到底，她是怕别人批评她为了我才改变了事奉的工场。有一个学生曾经在一本签名簿上写“Yours for India”（为印度献上自己），可是后来另一页又写着“Yours for China”（为中国献上自己）。结果她去了中美洲！有一天晚上，May Van Dine 小姐在 Anna 和 Irene 那里过夜。第二天早上她在灵修的时候，转身对 Anna 说：“Anna，你有没有想过，有时候我们会让别人可能说的话，把我们从神要我们做的事上引开？”她也不知道 Anna 一直在想什么。这让 Anna 确信，她可以接受去菲律宾也是主对她的旨意。

这些年来，我们很多次都非常感恩，因为我们深信是主差我们去菲律宾的。我们的第一期特别艰难，有意想不到的挫折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和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困难。有一次，一位宣教士同工向我们提议，说我们来错了地方，应该另找一个事奉的工场。那时要半途而废、不做宣教士，是很容易的！可是我们有这个确据：主是以清楚、明确的引导差我们到那里的。所以，如果祂要我们离开，我们也需要同样清楚的引导。

我们在学校的第一年快结束时，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再回去读一年。我们对那里的情况不太满意，所以怀疑回去是不是明智。另一个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去工场之前结婚。在这件事上有一些很强烈的看法。英国和美国一些负责的弟兄坚持，订了婚的人至少应该先在工场待一两年再结婚。这样在承担婚姻的责任之前，有时间适应文化、学习语言。唯一的例外，是工场上的宣教士建议先结婚。

我们和 Wightman 先生通信时，他建议我们尽快去，而且应该先结婚。因为他们是我们这一群人在那里唯一的宣教士，很难为单身的人安排合适的住处。我们自然很高兴听到他的建议，Buffalo 的长老们也同意了。接下来的问题是，1922年那个夏天该做些什么，来进一步为宣教工作作准备。

一位好朋友安排 Anna 在 Buffalo 上一个助产士课程，相信这在宣教工场上会有用处。所以她的夏天就在学医和协助一位住在对街的基督徒医生中度过。这样，她除了上课，还能接生到规定的数目。其实在菲律宾，她很少用到这个训练。那里并不需要，因为大多数人都有医疗设施可以用。

离开 Brooklyn 的学校后，我们到了 Buffalo，我在那里见了她的家人。我想他们一开始对我并没有多深的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印象，直到有一个星期天晚上我在 Assembly Hall 讲道。那对我来说是一场考验，我花了很大的功夫准备。主满有恩典地帮助了我。听的人有没有在灵里得益处，我不知道，可是我确实知道家里人的反应很好。在那里的三个星期，我还帮忙开露天布道会、探访 City Mission，以及分发福音单张。

然后我前往 Ontario 北部。路上我在 Hamilton 参加了一个 Dominion Day（加拿大自治领日）特会，我的老朋友 Tom Baird 是讲员之一。他好心地介绍我是一位即将出发的宣教士。在 Peterborough 住了一晚后，我继续前往 Haileybury。在那里我找到了 Sam Taylor 先生的家，他是在那一带为主做工的布道家，当时正在那里带领一个特别的布道运动。他是一个很勤劳的人，严格要求自己，也期望别人一样。他一开门，我就自我介绍，他招呼我说：“欢迎，如果你是来做布道家的工作的话。”我听出了他对“工作”这两个字的强调，后来我发现那里确实有工作要做。

团队里的其他成员稍晚才到：Tom Baird 在那里度过了夏天的一部分时间。他的信息、查经和私下的谈话真的很有帮助；Arthur Smith 待人亲切讨喜，是团队里很受爱戴的一员。他是加拿大最出色的小提琴家之一，曾在一些一流的管弦乐团演奏过。听他演奏总是让人激动，虽然他从来不只是为了娱乐人而演奏。我们到一个小村子开露天布道会时，会有人从酒馆里探出头来喊：“Smitty 带着他的小提琴来了吗？”酒馆和台球厅里的人都会跑出来，听 Smitty 拉琴，也听他用动人的方式传讲福音。没有“Smitty”的时候，我们就是向看不见的听众讲道——如果有听众的话！

还有一位年轻的学校老师和他的新娘，Horace Lockett 夫妇。也许就是在那里，他得到了一些想法，后来促成了 Guelph 的暑期圣经学校。Hartshorn 小姐从 Peterborough 来，担任钢琴伴奏和独唱。让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我们惊讶的是，她和 Sam Taylor 之间开始了一段恋情。我们原以为他是个铁了心的单身汉！Sam 可不会唱歌！有一天吃午饭时，他对 Muriel Hartshorn 说："等我到了天堂，我会比你多一样喜乐——我第一次真的能唱歌了。"我们这群人当中还有曾和我们一起在 Brooklyn 的 Horace Davey，以及 Buffalo 的 Alvin Sauer。

上午专门用来查经。下午我们出去分发福音单张，走遍了整个 Haileybury 镇，也到偏僻的村子去开露天布道会。这些村子通常只有一家酒馆兼台球厅、一家带邮局的杂货店，还有十几户人家。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听，讲道是不容易的。星期六晚上，我们在 Cobalt 帮忙开露天布道会，那地方当时以钴矿出名。星期天我们会去 New Liskeard，在那里帮忙主日学和聚会。Haileybury 在 Lake Temiskaming 湖边，是个游泳的好地方，直到我们当中有几个人因为水上的藻类生了病。

九月初我回到 Buffalo，可是有些同工继续留下来做工。夏季布道运动结束后不到一个月，一场惨烈的大火席卷了那一带。Haileybury 几乎被烧光了，很多人丧了命。这当中无疑有许多人是在那个夏天的布道中听过福音的。同工们失去了自己的财物，不过在帮助别人疏散之后，自己也逃了出来。

9月20日，在 Carson 家里举行了一个简朴的婚礼，之后在楼上 Gibson 家的公寓里举行了招待会。我的亲戚没有一个能来，而我实在太兴奋了，当时发生了什么事都记不太清楚。为我们证婚的是从 Pennsylvania 的 Erie 来的 Hugh Kame 先生。他以前是浸信会的牧师，后来离开了那个宗派，和弟兄会的聚会一起事奉主。有些年轻人打算在我们溜走的时候追我们。可是我们从卧室的窗户爬出去，上了一辆等着的出租车，就这样甩掉了追我们的人。在 Statler Hotel 住了一晚之后，我们在 Niagara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Falls 度了一天的蜜月。我们可住不起更久!

我们离开 Buffalo 的那天，10月4日，忙得不可开交，特别是 Anna。她还需要再接生一次才够规定的数目，刚好 Dora Murset 那天一大早生了孩子，真是太凑巧了。那天下午她参加助产士的执照考试，我在家里把行李打包完。她及时赶回家换了衣服，又赶去 Assembly Hall 参加为我们举行的送别晚餐和聚会。许多朋友从会堂把我们送到车站，我们要搭夜车去 Chicago。卧铺两个星期前就订好了，可是让我吃惊的是，列车员说那个铺位已经有人了。原来售票员在票上写的是售票日期，而不是出发日期。我正和售票员交涉的时候，有一个人注意到我戴的加拿大退伍军人徽章。他也是加拿大退伍军人，就说服列车员把我们安排到一个空着的、更好的卧铺。在 Anna 那么累的时候，这是主的供应。

第二天早上到了 Chicago，接待我们的 William Trotter 太太看出 Anna 很累，就让她去睡觉，一直睡到吃正餐的时候。我们和 Tom Bendelow 夫妇一起吃饭，在那里听说了 Haileybury 的大火。那天晚上我在 Austin Street Hall 讲道，接下来两个晚上，借着 Tom Baird 的安排，我们在 Minneapolis 和 Duluth 举行了聚会。又停了几站之后，我们到了 Victoria。

这对 Anna 来说并不容易，她刚刚和自己的家人道别，接着又要第一次见我的母亲和姐妹们。她们非常隆重地欢迎她，把她当作姐妹来接纳。不过我想，Florrie 还没有完全原谅 Anna 把她的兄弟从她身边带走。Florrie 曾经和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男人有过一段不愉快的经历。后来发现他只是假装是信徒来追求她，他们就分手了。从那以后，Florrie 和我一直很亲近，常常每天早上一起走路去上班。不过，Florrie 从来没有让她的感情影响她在祷告和奉献上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在那里待了六个星期，探访 Victoria 的聚会（当时有两个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还有 Vancouver Island 往北的一些聚会。这些年来，这些聚会一直忠心地借着奉献和祷告支持我们。自然也有了许多变化。当年在我的推荐信上签名的人，现在都已经回天家与主同在了，最后一位是 John Thomson 先生，他在1980年11月安息主怀。可是一代又一代的后人，一直忠心地关心我们，也关心我们所从事的主的工作。

我们订好了11月30日从 Victoria 搭“S.S. Empress of Asia”号启航。这对我母亲来说很难受，因为第二天早上就是父亲蒙主接去的十五周年。那天晚上很冷，朋友们聚在码头上为我们送行。船开始离开码头的时候，我大声喊道：“不要停止为我们向我们的神呼求！”(1 Sam. 7:8)。我们的船舱里堆满了鲜花和一盒盒巧克力和糖果，有些是 Vancouver 的朋友送的，这艘船就是从那里起航的。当时正在供应晚餐，可是我们宁愿上床睡觉。

第二天早餐时，总管事看到我们很惊讶；他以为我们被落在 Vancouver 了。那里有一位老太太一直在找我们。船上有一群 Scandinavian Alliance 的宣教士，要去中国，虽然他们的英语有限，我们还是很享受和他们的交通。有一天下午，另一位宣教士告诉我们，她听到那群人中一位年长的女士在船舱里哭。Anna 去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可是她一听，才知道这位亲爱的姊妹正跪在那里，为中国失丧的灵魂恳切祷告。

绕过 Aleutians（阿留申群岛）时，天气非常寒冷，风浪很大。有时甲板上结满了冰，乘客不准出去。在 Yokohama，我们几个人去 Tokyo 观光了一天。回来的时候，我们在一个标着 Yokohama 的车站下了火车，可是很快就发现，这不是我们早上上车的地方。我们想自己找路走回船上。很快我们就迷路了，在窄窄的街道上转来转去，正在准备晚饭的日本人好奇地打量着我们。即使在那时，也已经有一些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反美的敌意，所以他们看起来不太友善，我们也找不到一个会说英语的人。最后我们回到了出发时的那个车站，显然是绕了一个圈。车站里还有别的乘客，也有类似的经历。我们一起找到了一个能用英语给我们指路的人。不到一年后，Tokyo 和 Yokohama 的大部分地方都被一场大地震和大火摧毁了。

船也在 Kobe 和 Nagasaki 停靠；在 Nagasaki 是为了加煤。船在海湾里抛锚后，装满煤的驳船就靠了过来。人们很快就在驳船上和船身旁搭起了竹子脚手架，不久上面就挤满了男男女女，他们把一筐筐的煤一个传一个，倒进滑槽里。到了下午，活就干完了，船员们忙着清除甲板和船身上的一层煤灰。

下一站是 Shanghai，船停泊在 Whangpoo River 河口。乘客们坐小汽艇沿河而上进城——在十二月中旬，那真是冷得刺骨。我们有 Parrott 医生和他太太的地址，看到她打开暖气，我们真是感恩。难怪中国人冬天要穿棉衣！那个星期天，我们很享受和他们的交通，也和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的 Eldridge 先生有交通，他以前是该会在 Manila 的代理人。

船星期天晚上离开 Shanghai，星期三早上到达 Manila。一下子从冬天的寒冷跳到了热带的炎热。我们常常回船舱换上凉快些的衣服。星期三一大早我们就起来了，要第一眼看到菲律宾群岛，这是主为我们拣选的地方。从主说“到菲律宾去”到那时，才刚过了一年多。我们赞美祂一路这样带领我们向前。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第 8 章

开始我们的宣教工作

“看哪，我与你同在。你无论到哪里去，我都必保护你……我绝不离开你，直到我成就了我对你所说的话。”(Gen. 28:15)

第一次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上岸，总是一种有趣的经历。我们的船一通过检疫，就有一大群人上船来。其中有 Wightman 太太（Wightman 先生当时正好出国了），还有 Jesus Alvarez 先生，他是 Walled City 聚会中一位年轻的弟兄。他以前是学法律的，可是在他真正认识主之后，决定把一生献上事奉主。我们到达的时候，他正在 Walled City 帮忙做工。后来他去读了神学院，回到他原来的宗派，最后在那里成了一位主教。

第一天晚上，1922年12月20日（那天本来是我父母结婚36周年纪念日），我们去了 Walled City 的会堂参加祷告会。在那里，信徒们热情地欢迎我们，能见到他们，我们也非常喜乐。我们抱怨天气热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现在是冬天！所以我们很怕热季的到来，不过其实也没那么糟，因为随着气温升高，我们也慢慢适应了。其实温差并不大，因为一年到头气温的变化不超过华氏三十度左右。

也许这里适合岔开一下，讲讲在这里被称为弟兄会的人中间，这工作是怎样开始的。我引用我在1929年写的一本“Echoes Manual”里的话。

“这里照着圣经原则开始的工作，不只一个人有份，可是第一个开始这样一个聚会的人，是 William Averyt 先生，他这样写到他来菲律宾的经过：

“‘1911年7月8日，大约一点钟，在我的房间里，在 Jonesboro,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Arkansas，神借着祂的儿子，使我的灵魂得着平安……祂很快就把我推出去，离开人的依靠，进入庄稼的田地。我被差到菲律宾群岛，驻扎在 Cuartel de Espana 的第13步兵团，后来又到 Ft. McKinley……圣灵非常明确地带领我到 Walled City 的高中学生当中。'

"他来了不久，大约在1912年初，就开始到这些学生的房间里探访他们。最早得救的人当中，有 Sulpicio Guillen 和他的表兄弟。（Guillen 先生多年在 Manila Daily Bulletin 做排字工人。退休后，他搬到 Lanao del Norte 的 Kapatagan，他在那里有些农地。他几年前去世了，可是我们仍然和他的遗孀通信，她现在八十五岁上下，身体很虚弱。）

"稍后，在 Walled City 的 Calle Victoria 的一个房间里开始了一个查经班，大约在那个时候，Moses T. Barlow 少校（当时是上尉）从 Albay 暂时调过来，认识了 Averyt 先生。他们一起在神的话语上有很多美好的交通。后来，在1913年，Barlow 少校又到了 Manila，下面是他自己对那些日子的叙述：

" 'Averyt 弟兄对 Barlow 太太和我都有很大的帮助。他让 Barlow 太太信服，她应该顺从主，受信徒的洗，并且在 Manila Bay 为她施洗。他也帮助我明白了许多真理。

" 'Averyt 弟兄告诉我们，他一直在教导这些学生，他们几乎全都承认自己得救了，也都受了洗。他告诉我们，他一直朝着一个目标努力，希望开始一个正式的聚会，每个主日照着神所定的方式，凭着信心围绕着祂的桌子聚集，知道祂照着祂的应许就在我们中间。就是在我们在 Manila 的时候，这个聚会开始了。Noronha 太太和她的女儿也确信那是她们该在的地方，就常常和我们一起聚会。我们的认识并不完全，可是我们只是照着圣经去做，主就垂听了我们求明白的祷告，满有恩典地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把祂的旨意向我们显明，正如我们信靠祂会这样做。在 Calle Victoria 那个学生房间里的那些聚会，是我们任何人参加过的最敬虔的聚会。那里有一种属灵的温暖，一种恳切寻求神的心，结果就有圣灵确确实实的同在。我怀疑，在我们与救主在空中有那场伟大的相聚之前，我是否还会参加比那更属灵的聚会。那时，在聚会中有交通的有八九个人。

“‘我在1913年12月15日离开 Manila 去美国，1914年6月2日回来。在美国的时候，我被接纳到 San Francisco 的聚会中有交通，也学到了很多东西。那个小聚会仍然存在，不过是在 Malate 的 C. H. Noronha 太太家里聚会。我很惊讶也很感恩地发现，我的连队就驻扎在 Manila 市里。只过了一个多月，连队就调到别处去了，可是我常常进 Manila，在我们终于在1919年6月19日离开菲律宾之后，聚会仍然在 Noronha 太太家里继续进行。’”

George Wightman 夫妇因为墨西哥的某些法律，被迫离开他们在墨西哥 Tehuacan 的工作，就在主面前寻求另一个事奉的工场。他们和 Barlow 少校取得联系后，得知他一直在祷告，求主在他回美国以后，有人来接续这里的工作。Averyt 先生也回到了美国，在 Chicago Tribune 报社工作。1929年3月，我们第一次回国休假时，我有幸在那里和他一起吃午饭。三年后，他回天家与主同在了。Wightman 夫妇相信这是主对他们的旨意，就在1919年5月来到菲律宾群岛，正好在 Barlow 少校一家回美国之前一个月到达。

他们看到在 Walled City 的学生中间有很好的机会，而那里又没有别的工作，就租了一个会堂。这个会堂就在天主教大教堂的正对面，1919年7月开放，用了两年。后来搬到了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Victoria Street 和 Magallanes Street 的拐角处，也在 Intramuros。这些房子必须翻修，才适合作聚会的地方。当时那一区大约住了14,000人。许多旧式的西班牙住宅里住满了学生。不过那里天主教的影响很强，在那片一平方英里多一点的地区，就有好几座他们的教堂和机构。

Barlow 少校是一个很积极的同工，他鼓励在 Fort McKinley 周围的 barrio（乡村）举行聚会。菲律宾籍士兵和他们的家人就住在那里。1920年春天，在 Masilang 买下了一座简单的竹子房子，Wightman 夫妇就在那里继续做工。那里离城大约六英里，不过坐电车很容易到。

要在 Walled City 和 Masilang 两个地方建立长久的工作，有两个难处。一个是学生和士兵都是流动的。学生通常读完书、开始到别处工作时，就会离开 Walled City。士兵不是被调到别处，就是退伍了。另一个难处是语言。这两群人来自菲律宾群岛的不同地方、不同的语言区。Walled City 的聚会用英语，因为学生们是用英语读书的。在 Masilang 大多用他加禄语，虽然很多来聚会的人他加禄语并不流利。

我们到达 Manila 时，我正在海关办理行李通关，有一个穿便衣的菲律宾人走过来。他问我有没有带枪的执照，让我吃了一惊。“没有，”我回答，“我一辈子都没有过枪！”接着他想知道我后裤袋里装的是什么。我笑着说：“那不是枪——是一把剑！”我掏出我的袖珍圣经时，他相当困惑。当然，他不会明白我说的剑是什么意思。他还是心存怀疑，因为我到另一栋楼去取货舱里的行李时，他又出现了，并且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坚持要打开箱子。也许他还希望找到一些武器呢!

因为聚会是用英语，我马上就被安排工作了。1922年的最后一天是主日，离我们到达才十一天。那天早上有人请我讲道，我就祷告，求主赐福我在新的事奉工场所传的第一篇福音信息。我求主，如果合祂的旨意，就让一个灵魂得救，来印证祂呼召我们到菲律宾。主真好，满有恩典地应允了那个祷告。讲完道后，一个名叫 Joaquin dela Cruz 的年轻人接受主作他的救主。他以前对圣经有些认识，可是他要求当天就受洗，让我们很惊讶。资深的宣教士不在，得由我来作决定。我所受的训练和经验中，从来没有包括考核受洗的人。不过我的想法是，信主的人应该等一段时间，来证明他们真的悔改了。Joaquin 可不让人这样拖延。他一句话就为我们定了案：“明天就是新年了。我要以新的生命开始新的一年。”所以那天晚上，我们一群人到了海边，就是现在 Manila Yacht Club 所在的地方。在明亮的热带月光下，我们举行了一个小小的聚会，我有幸为我事奉主以来第一位菲律宾信徒施洗。

Gospel Hall 是 Walled City 唯一的基督教（新教）工作。聚会用英语，来的大多是年轻的男学生。除了宣教士，只有两对夫妇，没有年轻女子。Anna 和我是新婚夫妇，觉得这种情况不理想。那些年轻人会到别处去找女性的陪伴，我们就会失去他们。可是在那个年代，要让年轻女子来聚会可不容易。她们被小心地看护着，不会单独出门。年轻男女从来不会单独一起出去，总是有别人陪着。来城里读书的女孩们会向她们的母亲保证，要忠于她们自己的教会。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她们没有年轻男子那种敢闯的精神。

我们和一位宣教士朋友谈到这个问题。他觉得，要建立长久的工作，学生工作有一个弱点。必须接触到整个家庭，因为父母信了主，孩子很可能也会跟着来。我们想吸引年轻女子来聚会的努力，结果几乎都是白费。

因为那里没有主日学，我们就开办了一个，请了一些邻居的孩子来参加。这需要用他加禄语，所以我们的部分只限于教孩子们唱短歌和用英语背经文。还有别人帮我们教，其中一位就是 Joaquin，虽然他是 Visayan（米沙鄢人）。主在一些年纪大一点的孩子心里动工，我们很喜乐地看到其中有些人信靠基督得救。

后来，我们请了两个十几岁的女孩来我们家住几天。有一天晚上，她们已经回房间了，我在薄薄的墙另一边的书桌前工作。两个女孩正在讨论。一个说，人得救以后就不会再犯罪了，另一个不同意。我忍不住听到了她们的话。为了证明她的看法，其中一个女孩拿我当例子，说我得救了，我就不犯罪！第二天早上在早餐桌上灵修时，我们尽力在这个神学问题上把她们纠正过来！

很快我们就意识到，我们需要学他加禄语。虽然英语很普遍，因为当时所有的教育都是用英语，可是要和人更亲近，就非懂他加禄语这个菲律宾的主要语言不可。不过，那时没有语言学校，语法书和字典也很少。信徒中的 Guillen 太太帮我们学他加禄语会话。有一段时间，我们付钱请一位小学校长每星期六给我们上课。效果不太理想，因为她没有准备，也不明白一个非菲律宾人学这个语言会遇到什么困难。有一天，她教了我们一些规则和一些词汇之后，我们问她：“你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些关于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句子构成和结构的规则？”她想了一会儿，说：“哪种说法最好听就怎么说！”在我们听来，没有一种是最好听的！可是她说得对，因为他加禄语是一种悦耳的语言，确实有些说法听起来最好听。

我们很幸运，得到了 Barlow 少校留下来的几本旧语法书和一本旧字典，可是一种语言不能单靠书本学会。我们需要离开 Manila，因为那里英语很普遍，语言又多。虽然 Jesus Alvarez 是 Camarines Sur 的 Bicolano（比科尔人），他还是安排我们去 Camarines Norte，那是当时讲他加禄语地区的最南端。我们先在首府 Daet 租了一个中国商人的房子，租了两个月。这让我们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可以在那个省里四处看看，找另一个地方。我们在那里的两个月里，附近发生了一场火灾，烧掉了好些房子。我们被喊叫声惊醒，看到火就在后院对面的街上。我们急忙把我们仅有的几件东西大都丢进箱子和手提箱里，装上院子里的一辆水牛车。如果火越过街道，我们就准备撤离。车旁边是一间镀锌铁皮做的仓库。我很纳闷，为什么那些中国人要把湿麻袋铺在屋顶上。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他们存放汽油和煤油的地方！后来人们拆掉了火路上的几间棚屋，又排成长队用水桶从河里拼命运水，火才被控制住。

我们在 Indang（现在叫 Vinzons）找到了一栋房子，租下楼上，每月十比索（$5.00）。我们本来希望能把楼下租来作 Gospel Hall，可是房东在那里存放着稻米。很快我们就发现，这会招来老鼠，我们也就习惯了晚上看到老鼠在我们头顶的椽子上跑来跑去。蚊帐挡不了什么，幸好老鼠的脚步很稳！捕鼠器没什么用，不过有一天晚上，一条稻田蛇解决了一只老鼠。

Indang 没有福音派的工作，据我们所知，只有一个人自称是挂名的新教徒。这个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社区完全在教区神父的控制之下。每天教堂的钟都会为婚礼、庆生或葬礼而敲响。这些事每一样最少要收 P25.00，对穷人来说是个重担。所以常常有人来请我们捐点钱帮忙。有一天，我们的洗衣妇想知道我去哪里了。Anna 告诉她，我到 barrio（乡村）里去卖圣经了。这个不识字的妇人说，神父告诉他们圣经是坏书，他们不该读。她还说得很肯定，神父靠着他们发了财，可是他们还是去找他认罪。不过她也承认，他不是好人，因为他有自己的女儿住在教堂的房子里。

我们的他加禄语还不够主持聚会，不过我们在家里给孩子们开班，教他们背经文、唱短歌。有一天晚上，我们出去散步，正好从神父身边经过时，听到一户人家里传出孩子们的歌声：“The best book to read is the Bible”（最好读的书是圣经）。我们有一块大黑板，我每天在上面写一节福音经文，放在房子前面的架子上。所有过路的人都看得见，孩子们却够不着。

我们在那里过的第一个受难节，游行队伍从我们家门前经过。别家门口都点着一根蜡烛；我们家有的是神话语的光——队伍慢慢经过时，每个人都读了。游行队伍抬着各样的神像，其中还有镇上唯一的一辆灵车。那是在给基督下葬！灵车里有一口棺材，棺材里躺着一尊和真人一样大的基督像。有那么一刻，基督（哪怕只是一尊像）躺在棺材里，这么不相称的景象让我们非常难受。接着，在圣灵的带领下，我对站在身旁的 Anna 说：“祂是活着的！”那一刻，复活的真理变得无比真实。

背着一袋圣经徒步四处巡回，有两个目的。这是传扬神话语的一个方法，也让我们有机会听他加禄语、用他加禄语。我们不只走遍了 Indang 镇，也去了别的城镇。我们特别喜欢的，是穿过椰林，或者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走过稻田，去那些偏僻的小村子。我们会带一个三明治当午饭，再买一个青椰子——那是大自然亲手装瓶的饮料，安全又干净。过了一阵子，Anna 只好留在家里，因为她怀上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Labo 城外有一条河，所以中午我会走出城一点，到河里泡一泡，再吃午饭。住在对街的 Indang 校长警告我，那条河里有鳄鱼。

这也是了解当地人文化的一个途径。我发现，往往是女人管钱。不止一个男人已经被说动要买圣经，可一跟太太要钱——这笔买卖就泡汤了！有时候他们没有钱，我就收几个新鲜鸡蛋或几根新鲜玉米代替。人们会笑这个疯狂的“Americano”说错话，可他们脾气好，而且照菲律宾的习惯，非常好客。他们看着那四本福音书——San Mateo、San Marcos、San Lucas 和 San Juan——就想知道我有没有 San Geronimo 或 Santa Maria。我给人看 San Pedro 写的书信，就卖出了不止一本新约！

生活很简陋。我们家有“自来水”——就是我们从门外的井里提着跑回来的水！有一天早上我们正要起床，我听见对街的男孩在打水。第一声“扑通”是水桶，可第二声“扑通”一定是那男孩！果然，男孩掉进井里了。邻居们很快围过来，讨论他是怎么掉下去的。我说：“别管了，先把他弄上来吧。”于是他们放下一根长竹竿，男孩顺着爬了上来，浑身湿透地站在大家中间，大家还骂他不小心。我们的邻居跟我们的帮工说，美国人很脏——他从来没看见他们在井边洗澡！她告诉他，我们把厨房的一角改成了浴室——地板是竹条铺的，根本不怕下水道堵！他可不信——眼见为实嘛！

有一天下午，我们坐在家里学他加禄语，一边嚼着手指那么大的小香蕉，忽然天好像阴了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下来。真奇怪，因为那时候不是雨季。我们听见人们大喊大叫、到处乱跑；他们赶紧把井盖起来。一大群蝗虫飞来了。它们落下来，把地面和屋顶都盖满了，有些人用麻袋把它们铲起来。有人吃它们，有人不吃。这些蝗虫显然已经在别处吃过了，因为我们后来听说，它们在别的地方毁了庄稼，连椰子树都没放过。我正看着对街一栋又长又矮的房子，有那么一刹那，屋顶好像飘了起来，其实是那一大片蝗虫同时起飞了。

几个月后，一场毁灭性的台风扫过那一带。后来我在一个地方看见一片蕉麻，好像被一把巨大的镰刀齐齐割断了。那天清早风很大，把屋顶的 nipa 茅草都掀了起来，雨水把我们浇透了。我想楼下也许安全一点，就下去看看。我几乎顶不住风，站都站不稳。楼下的前墙已经向外倒了，我们好不容易才躲到那里，跟大米和老鼠作伴！很快，我们的屋顶就"随风而去"（Gone with the wind）了。到了上午过半，风雨很快就停了——我们正在风眼里。我们知道风暴很快会再打过来，只是风向相反，于是就跟一大群人一起躲进街那头的面包店。那是一栋结实的矮房子，他店里的面包糕点很快就卖光了。我们大家挤在一起，一直待到下午过半。

风暴过去了。我们家里唯一干的东西是 Leonard 的婴儿床，因为我们用一块油布盖住了它。至少宝宝有一张干床。缝纫机的木头部分散成一堆，落在铁架子下面。绒布经文上的字母被贴得满墙都是，东一块西一块。一箱刚到的圣经被吹开了，里面的书全湿透了，散落一地。这可不是撒播神话语种子的理想方法！一位友善的店主让我们暂时住在他店铺楼上的一个房间，他自己也住在那里。神父为这件事很生他的气，以为这是把我们赶出镇子的好机会。他还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劝房东不要修屋顶，直到我告诉房东，他的大米开始发芽了。这下他就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教会的利益前面了。那是我们唯一一次吃到人称“1000美元沙拉”的东西。镇上一个智力不太好的人给我们送来一棵被风吹倒的椰子树的树心。非常好吃。它之所以贵，是因为取了树心，树就死了。

学语言的时候，我们闹了不少笑话。他加禄语里有一个词，是转述别人说的话时用的。人们会问我一本福音书多少钱。我会回答：“两分钱（centavos）。”然后有人会跟其他人说：“Two centavos daw.”我不知道“daw”是什么意思，可我一用这个词，他们就哄堂大笑。后来我们又一再听到一个词：“Kwan”。

每次我们问“Kwan”是什么意思，得到的答案都不一样。真是把人弄糊涂了，直到有一天下午我忽然开窍了，对 Anna 说：“Kwan”的意思就是“那个什么来着”，人和东西都能用。我们常常试着用他加禄语讲话（带着美国口音），结果人家回答：“我听不懂英文。”真是叫人泄气。有一天，有个人用他加禄语回答我——他听懂我想说什么了！那可真是一大成就！

有些主日早上，我会去 Daet 的长老会教会，因为我们住在 Daet 的时候就认识了那里的人。他们常常请我讲道。我发现，有时候翻译的人不是照我说的翻，而是照他们自己的想法，翻他们认为我应该说的话。所以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结结巴巴地尝试用他加禄语讲道，其实更像是念一篇讲章。主日下午，Anna 和我就简简单单地守主的晚餐来记念主，只有我们两个人。有一天，我们这小小的聚会结束后，我特别感受到主的同在。我离开桌子，跪在客厅里一张当沙发用的行军床旁边。没过一会儿，Anna 也过来跟我一起跪下，我们默默地继续敬拜，为祂一切的恩典赞美神。我们深深感受到主就与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我们同在，虽然我们知道方圆几十里内再没有别的信徒。

我们住在 Indang 期间，为了第一个孩子出生，必须去 Manila。当时 Camarines Norte 还没有像样的医疗设施。路上我们得经过 Camarines Sur 的首府 Naga。幸好那里有一家勉强算是旅馆的地方，因为我们在那里耽搁了将近一个星期。原本要载我们从 Pasacao 到 Aloneros 的船正在船坞里修理。在 Manila，我们住在美国圣经公会的代理人 G. B. Cameron 夫妇家里。Anna 生 Leonard 的时候相当辛苦。我们早上五点刚过就去了 Mary Johnston Hospital，宝宝在快到午夜的时候才出生。Rebecca Parish 医生负责这家妇产医院——她是一位非常好的医生，也是一位很好的基督徒。如今 Mary Johnston Hospital 离海边隔着好几个街区，四周是贫民区和港口。那时候它就在 Manila Bay 的海边，渔夫们会把渔网摊在医院的海堤上晒干。有很多土地是从海里填出来的。

Leonard 是个乖宝宝，晚上很少醒。他在 Indang 很吸引人，因为他是那个地方的第一个白人宝宝。孩子们喜欢看他早上洗澡，他也很喜欢把水泼到他们身上。傍晚我们带他出去散步，老太太们会说："他没有头发。"接着她们轻轻摸着他的头和金色的头发，说："哦，不对，他是有头发的——像麻一样。"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第 9 章

回到 Manila

“可是神偏偏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人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些强大的羞愧。”(1 Cor. 1:27)

是时候决定我们要在哪里服事主了。我们应该继续留在 Camarines Norte，努力在那里建立一个聚会吗？还是应该回到 Manila，帮忙建立那一带的工作？很明显，要在 Indang 建立一个本地人自己的聚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有几个人特意来找过我们，可他们都是从别的地方来的。Indang 似乎太受神父的影响了，大人们不会很快回应我们的信息。我们相当孤立，因为去 Manila 的交通有时候没有把握。我们只有自己两个人，等到要回国述职的时候，那里的工作看来也不太可能自己站得住。所以我们决定回 Manila。

那时候，Wightman 弟兄已经开始做生意养活自己，同时继续在 Walled City 做工作。我们在 Ermita 租了一间公寓，走路就能到 Gospel Hall。那些日子里，信心的考验很多。去 Camarines 之前就已经有过难处。有一段时间，我们有一本买面包的票，可我们只付得起几分钱，买一罐番石榴果酱抹在面包上。1923年1月9日，我写道：“钱不多了——应许却很大。”那时候还没有震耳的收音机，可隔壁邻居有一台留声机和几张唱片，从早放到晚。有许多个傍晚，我们走到海边，坐在岩石上看有名的 Manila 日落，也图个清静。

我们住在 Ermita 的时候，经历了很严峻的考验。不止一次，我早上出去卖圣经，才凑够钱买一些干豆子当饭吃。有一天早上，家里只剩下一点面包。可就在我们穿衣服的时候，一位菲律宾信徒从省里来了，带着“pasalubong”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见面礼）——鸡蛋和水果。他根本不知道他为我们送来了早餐！我们知道，主允许这样的试炼临到，是有祂的目的的；这些试炼当时看起来那么难熬，可后来总会有祝福。“凡是管教，当时都不觉得快乐，反而觉得痛苦；可是后来，它会为那些经过操练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Heb. 12:11)

过了好几年我才发现，那些接受以色列人十分之一奉献的利未人，自己也要献上十分之一。因为我们一直把实际生活费用以外能省下的，全都奉献给主的工作了，所以从来没想过要从我们收到的钱里拿出一部分来奉献。说真的，我们收到的一切，不都以某种方式用在服事主上了吗？可是我们可以作见证：从我们开始把特别的一份献给主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受过那么严峻的考验。当然，有人会说，这是因为那时候认识我们的人更多了，这无疑也是一个原因。

有一个星期六晚上，我们收到 Victoria 一位朋友的来信，信末附了一句话，为我母亲被主接去向我们表示慰问。这真是晴天霹雳，因为我们连她生病都没听说过。我的姐妹们觉得，与其发电报让我受惊，不如写一封信把详细情况都告诉我。那时候还没有航空信，而那位朋友的信刚好赶上了一班更早的船。第二天早上我已经约好要讲道，讲的是司提反殉道。在那样的情况下，这可真不容易。过了一段时间，Anna 收到消息，她的妹妹 Mae 去世了。不过这没有那么突然，因为她病了很久。可是想到那位美丽的年轻女子在青春年华就被接走，心里还是很难受；但安慰的是，她们两人都已经“与主同在”了。

就在母亲被主接去不久，1926年5月2日，Kenneth 在 Mary Johnston Hospital 出生了。为了纪念母亲，我们给他取的中间名是 Sheldon，那是我母亲的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娘家姓。他很小就得了支气管炎，虽然好了，却好像影响了他的睡眠习惯。晚上我们想哄他睡觉，他就是不肯，甚至一边揉眼睛一边硬撑着。

第一个任期里另一个叫人灰心的问题，是和同工之间的矛盾。这让我们非常心痛。我们那时年轻，没有经验，团队里也没有别人可以商量。回顾这些年，我们现在知道当时应该换一种方式回应，可那时我们需要辅导，却找不到人。这段经历教导我们，即使面对我们当时认为是错的事，也需要忍耐和爱心。

不过，我们回到 Manila 一带重新开始工作，也有不少亮点。除了在 Walled City 租来的礼堂里的固定聚会，我还在我们那里的一家书店帮忙，这让我们接触到不少人。也是在那时候，我开始挨家挨户走访 Walled City 的每一户人家。这花了不少时间，因为那些古老的西班牙式房子里住着几十、甚至几百个人，每个房间住好几个人，非常拥挤。有些人住在楼梯平台和楼梯间用帘子隔出来的地方。光是一栋大房子，就可能花掉差不多整个上午。有一天，我正在一个院子里跟一群人讲话，忽然有人从上面泼下一盆水，正好浇在我们身上。看来不是故意的——那人是先泼水后看人！后来，我们把这样的分发圣经扩展到 Manila 的 Pasig River 以南差不多所有的区。

Fort McKinley（现在的 Fort Bonifacio）附近 Masliang 的工作继续进行。可是那间竹子和茅草搭的礼拜堂太破旧了，我们决定不用了。在通往 Guadalupe 军营的大路上，我们找到一间临街的店面租下来，儿童班和传福音的工作就在那里继续。我们也带着书刊和邀请卡走遍了这一带，可回应很少。人们不太愿意去了解一个他们眼中的新宗教。1929年我们回国述职期间，这里的工作就停了。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有一天早上我在看书店的时候，一个常来聚会的年轻人来找我谈话。Simeon Endaya 是个安静的人，在邮局当职员。他告诉我，他从小在罗马天主教长大，还当过辅祭。后来他家转到了独立的 Aglipayan Church，那是从罗马教会分出来的。Simeon 在 Manila 读高中的时候，偶然走进了一间卫理公会的教会。他在那里被接纳为会友，用点水礼受了洗，那已经是第二次，也许是第三次了。通过 Gospel Hall 的见证，他现在信了基督。他需要受浸礼吗？我给了他一些经文去查考，叫他自己看看主要他怎么做，不要只听我的话。第二天早上他又来了，请求受浸。

有一天晚上，他在邮局挂号部工作时，签收了一大笔要寄往 Culion Leprosarium（麻风病院）的钱。原定第二天早上开往 Culion 的船没有按时开航。Simeon 回到办公室一查，最后找到了那个袋子，里面却是空的。外面请来了侦探，他们怀疑 Simeon，因为不但是他签收了袋子，也是他发现袋子空了。他们审了他一整天，可他坚持自己是清白的。快到傍晚的时候，一个侦探指责他向他们隐瞒了什么。Simeon 回答说："是的，有一件事我还没告诉你们。"他们大声喊："那就快说吧，说出来！"他说："我还没告诉你们我的救主。因为我信靠祂，所以我不可能偷那笔钱。"他被放了，但仍受到监视。几个月后，邮局的一个清洁工忽然好像有了很多钱——他才是真正的犯人。

Simeon 在祷告会上作见证时，大概是这样说的："经过这件事，我体会到那保守我们心怀意念的平安。你们会说：'你有平安，是因为你知道自己是清白的。'可事实不是这样。我有一个同事，他也是清白的，却一点平安都没有。他去 Quiapo 教会向黑色基督像（一尊有名的神像）祷告，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可还是没有平安。"Simeon 有机会向他作见证，告诉他真正的平安来自基督。

聚会时间，我们当中常有人站在礼堂外面，想劝路过的人进来。其中有一位老人，名叫 Lutgardo Ramos。他染上了酗酒和赌博，穿得很破旧，很不愿意走进礼堂。可是不久，当他信靠基督作他的救主以后，他的生命彻底改变了。他太太非常反对。她不让孩子们来主日学，还把他的圣经拿走了。就连我们去他家探访，她也几乎不理我们。这很不寻常，因为菲律宾人一向好客。Ramos 弟兄不管多难，都忠心地坚持下去。连他穿衣服的样子都看得出改变。他作见证时常常提到这一点。后来我们在 San Juan 开始工作的时候，他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他喜欢传福音，而且总是讲约翰福音。在我们第二次回国述职期间，他回天家与主同在了。

差不多同一个时候，一个很不一样的人开始来参加聚会。他是卫生局的首席文员，受过很好的教育。他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跟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人有过一些接触，可心里并不满足。他来到礼堂，在基督里找到了真理，很快就积极为主做工。在 David Shepherd 的帮助下，他在 Paco 区的家里开始了一个聚会。David 是从苏格兰 Paisley 来的自费宣教士，管理一家制版公司，为美国圣经公会制作印刷圣经用的版子。Paco 的工作发展起来以后，他们在1931年租了一间临街的店面。Geronimo Mercado 为他家乡 Rizal 省 Tanay 的需要有负担。他星期六中午一下班就直接去那里。聚会在星期六晚上和主日早上举行，天气好的时候常常在露天。后来，这个见证扩展到邻近的 Pililla 和 Guisao 两个镇。在 Pililla 盖了一间小小的竹子礼拜堂，在那里受洗的信徒当中，有一位96岁的老人。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主日下午，Geronimo 会回到 Paco 参加那里的聚会。另一位曾经在这些事工上帮过一阵子忙的人是 George Burns。他是新英格兰人，一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落下部分残疾的退伍军人。他靠退休金生活，热心分发福音单张，也热心个人布道。Mercado 弟兄后来捐了一块地，在 Tanay 盖礼拜堂。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去世，他的遗孀几年后也去世了。他的女儿们和她们的家人都在 San Juan 的聚会里很活跃。Geronimo Mercado 有翻译的恩赐，翻译了好几首敬拜诗歌，还自己写了一些他加禄语诗歌，这些诗歌到今天还收在我们用的诗歌本里。

他的弟弟 Sergio 是后来才得救的；我们1949年回到菲律宾以后，他常常跟我们一起去 Tanay 帮忙那里的工作。他也在卫生局工作，负责疟疾防治。他的工作常常要出门，就是在其中一次出差时，他坐的公共汽车遭到反叛分子伏击。Sergio Mercado 弟兄是遇难者之一。这是很大的损失，因为他跟他哥哥一样，很用心研读神的话，也很有讲道的恩赐。

1927年，华中地区发生严重的共产党动乱，有两位宣教士从那里过来，跟我们一起同工了一段时间。James Buckley 来自加拿大 Ottawa，Fred Pucknell 来自英国。Jim 买了一辆旧的 Model-T Ford。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会记得这种车，Henry Ford 就是靠它让工人阶层也买得起汽车。它没有现代汽车的那些方便设备。可是它够简单，懂点机械的车主大多数毛病都能自己修。我们拆掉后座，装上箱子，用来装补给、器材和一批圣经。

我们会在星期一一大早出发，在路上一直跑到星期五晚上。开进一个镇子，我们就把车停在公共市场附近。一个人留在车旁卖圣经，另外两个人挨家挨户去走访。在 Manila 南边不远的 Las Pinas，有一架有名的竹管风琴，是19世纪初一位西班牙神父用竹子做的。我们在那里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走访的时候，我正在房子之间走着，忽然一阵骚动，男人们四散奔逃。原来是一场赌局匆匆散了，因为他们以为我是警察。等他们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就不好意思地回来了，我还聚了一群人，简短地作了见证。在另一个镇上，我无意中撞见一场赌局。有个人推说他没钱买圣经。我跟别人讲话的时候，他赌赢了一把，可他还是不肯掏钱买圣经。

这样，我们一天可以走两三个镇。到了傍晚，我们会找个地方，在我们带的帆布篷下过夜。通常要镇长或警察局长批准我们开露天聚会并不难。大多数镇子中心都有一个广场，有时候还有一个乐台。这些都是开聚会的好地方，只是在很多地方，镇上的教堂也正对着广场。有一个星期五晚上，我们在回家的路上停在 Laguna 的 Cabuyao。警察局长给了我们许可。我们开始聚会的时候，注意到神父在他的教堂前面走来走去。不久，一个警察过来通知我们，说奉镇长的命令必须停止。我们把警察局长给的许可拿给他看。那个警察知道镇上谁说了算，可我提议让 Jim 跟他一起去见镇长谈谈，Fred 和我继续进行。我们讲了很久的道，然后拿出圣经来卖。人群渐渐散了，可还是不见 Jim 的人影。他一直跟镇长谈，直到确定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把聚会开完！

就这样，我们走遍了所有讲他加禄语的省份。要找个地方过夜扎营并不总是容易。有那么几次，我们得到许可在镇公所里过夜。有一趟行程走了两个星期，我们越过山去到 Luzon 的东海岸，一条路去 Infanta，另一条路去 Atimonan。后面这条路要走一段陡峭的之字形山路，翻过那些山岭，那是整个岛的脊梁。起初当局不准我们去，因为有一段坡太陡，汽油靠重力供油，流不进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发动机。我们把油箱加满，签了一份免责书，他们才让我们过去。那辆老 Ford 爬坡一点也不费劲，可下另一边的坡就是另一回事了。刹车带全磨坏了；等我们终于回到平路上，连倒车带都没了。所以我们只好修车，还得让一辆卡车把我们拖回去。

在 Lucena，我们遇到一位老人，他有一本他加禄语圣经，看得出来常常读。他坚持说自己是罗马天主教徒，等我们向他保证我们不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人，他就很友善了。他显然是个信徒，在我们离开之前，他还给我们讲了一段简短的信息，讲新约里三次提到的“阿爸，父”。这显示他熟悉圣经，也有属灵的分辨力。不过，罗马教会的一些做法，他也没办法用圣经来证明是对的。

这样的行程我们走了五趟，去了63个镇（只有一个去了两次），开了35次聚会。大约卖出了7,000本圣经、新约和福音书，分发了两万多份福音单张。我们探访了许多家庭，也跟许多人有了个人接触。神话语的好种子撒下去了。其中有多少落在好土里，只有到了永恒才会显明。

每年，在现在 Manila 市中心的 Rizal Park 那里，都会举办一场大型的博览会和嘉年华。1921年，Wightman 弟兄在用来打广告的临时围墙上租了一块地方。他请人用大字在上面漆上约翰福音3:16。那一年，嘉年华正在进行的时候，一场大火把它烧毁了。Wightman 先生去看看能不能退一点钱，因为那段经文没有展示满合同规定的时间。（这一定是他苏格兰人的节俭。）他其实也没真指望，结果也没退到钱。他们告诉他，在那场火灾的新闻照片里，他那段经文显眼地出现在

第二年开幕那天晚上，我抱着一大摞福音单张，在入口开始发。其实用不着我发，人们自己就从我手里拿走了。有些人拿了一把，站在我旁边帮着发。半个小时，我抱的那一摞就发完了。我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四处去看看有多少被扔掉了，结果几乎没有。另一年，第二天晚上我们就被警察拦下来了；如果人们把单张扔了，我们就等于在乱丢垃圾。有一家商业公司雇了一架飞机从空中撒广告传单。他们不在傍晚人多、大家能捡的时候撒，偏偏在主日早上撒。那才是大规模的乱丢垃圾呢。

后来几年，我们在展览区租了一个摊位，卖圣经，发书刊。借着海报、幻灯片和个别的交谈，我们有许多机会把救恩的道路传开。有一天晚上，一群罗马天主教的修生走过来，准备好了要跟我辩论。我并不想辩论，可是周围有一群人，我不敢退缩。我尽量借着辩论和回答问题的机会传讲福音。有一次，他们说教宗是教会的元首。我问："你们相信圣经吗？"既然他们相信，我就翻到歌罗西书1:18，念给感兴趣的人群听。他们的回答是，教会有两个头，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我反驳说："现在我明白你们教会的毛病在哪里了。任何一个身体有两个头，都是畸形的，应该放在这嘉年华的怪胎展里展出。"这话说得不算厚道，可人群听了很高兴，他们却很狼狈，辩论也就这样结束了。

五年来，我们常常在叫人灰心的困难中坚持下去。去山上度假，我们根本负担不起，人也越来越疲惫了。可是在1928年1月，主让我们能够去 Baguio 待一段时间。Anna、Len、Ken 和我，坐三等火车到 Damortis。然后坐公共汽车，沿着 Kennon Road 爬升5000英尺到 Baguio。那时候这条路只够一辆车通过，所以交通靠一道道闸门来控制。公共汽车两边没有挡板，我坐在前面靠外边的座位上，感觉我的脚常常悬在路边的深谷上面。司机很小心，可开得很快，因为他熟悉这条路，也知道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不会遇到对面来的车。从最后一段之字形山路的顶上看下去，景色真是壮观。

我们租的房子是卫理公会的，就在 Easter School 旁边，那是一所给山区孩子读书的圣公会学校。小屋后面有一座高山，从山顶上，一边能看到 Baguio，另一边能看到 Trinidad Valley。这片肥沃的山谷以种蔬菜和草莓出名。Fred Pucknell 跟我们一起待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早上，我们坐出租车到 Baguio 城外七公里的 Mt. Sto. Tomas 山脚。Fred 和我从那里沿着一条八公里的山路爬到山顶，那里有一间休息屋。我们到的时候又累又饿，就进屋取暖吃午饭。这下错了——我们吃饭的时候，云涌了进来。周围群山和山下 Lingayen Gulf 的景色，我们连一眼都没看到。我们在那里遇到几个测量员，他们说下山时可以带我们去看一个 Igorot 人的墓葬洞穴。洞口很低，可里面我们能站直身子，四周都是头骨和骸骨。酋长们显然是葬在一种挖空松树做成的粗糙棺材里。Fred 说，要是他在中国的房间里摆这么一个头骨，就再也不用担心小偷了！山区的人从前是猎头族。所以为了确保我们身上那个要紧的部位保得住，我们什么都没动。后来几年，我们在一个月色明亮的晚上爬上 Sto. Tomas，去看群山上壮丽的日出。然后在休息屋吃过早饭，下午早早就回到家。

从 Baguio 回家的路上，火车非常挤。Anna 去了洗手间。几乎马上就有一个女人开始敲门。Anna 自然以为是有人等得不耐烦了，就没理她。后来他们叫我去处理。那个女人很胖，因为火车很挤，她只好站着。Anna 关门的时候夹住了她胳膊上的一块肉，她挣脱不出来。在火车和人群的嘈杂声中，我终于大喊着让 Anna 注意到了。那个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女人被放出来的时候，她的上臂上留下了长长一道肉棱。

在那之前一年，我们开始在离 Manila 市中心五英里的 San Juan 郊区买一栋房子。那是一个新开发的地区，Wightman 一家已经在那里买了房子。一位好朋友送的礼物让我们付了首期，每个月的分期付款比我们以前付的房租还少。搬家的一个原因是 Leonard 得了佝偻病，我们需要一个他能多晒太阳的地方。有了自己的房子，我就可以在能力许可的范围内自己动手改善它。

从 Baguio 回来以后，我们开始计划回国述职。那时候，宣教士一个任期要待满七年。英国有些弟兄表示担心，因为我们才第六年。1 月，Fred Pucknell 决定回中国去，因为那边似乎平静一些了。这期间，Jim Buckley 已经跟西雅图来的 Margaret Dryden 结婚了。我们家跟 Dryden 一家做朋友已经好几年了。他们打算暂时留在 Manila，所以我们觉得这是离开一段时间的好时机。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

第二部待续

故事在 *Grace Triumphant* 的第二部继续：第10–18章。

打开第二部

每一章也都列在目录里。

接下来

这是 *Grace Triumphant*，是*主啊，求你把这座山赐给我们*的姊妹篇。Cyril 与 Anna Brooks以及 Engle 一家的故事，请在第八卷中阅读。目录列出了本系列的每一本书。

> 请不要把任何功劳归给我们，免得夺去了神的荣耀。
>
> Cyril H. Brooks，引言

Grace Triumphant © 1985 Walterick Publishers。在这套家族系列中使用，每一页都附有版权声明。添加于2026年10月13日。